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19 世紀語言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發現了歷史比較法。有了這種方法才可能對於語言事實的獨特性和特點作嚴格的科學解釋和正確的分類。這個方法使得我們有可能提出和解決許多複雜的語言學問題，特別是親屬語言關係問題、每種具體語言發展的分期問題，並且對於了解語言發展的一般的和特殊的規律非常有幫助，只有借助於歷史比較法才能够正確地、有科學根據地解讀古老的早已死亡的語言，從而增加了我們對各民族古代歷史的知識，更加豐富了關於語法和詞彙語義過程（特別是印歐語系的）的知識，而最重要的是，只有借助於歷史比較法才有可能建立個別語言和語羣的科學歷史。歷史比較法的出現，對於語言學這門獨立的科學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強大的推動力，語言學史上的一個新的、極重要的階段正是從這裡開始的。

歷史比較法的發現不是某一個國家的事情，比較各種不同語言這個想法，是因為有共同的前提而在若干國家同時產生的，這個前提就是 19 世紀初葉在歐洲已經收集了一些關於古印歐語的材料，並且在這一時期科學知識的發展水平也大致相同。最初只是在某些詞的語音和語義相似的基础上来比較語言，而對於語言的形式不作歷史的分析，如 1811 年出版的一位佚名的俄國作者寫的“論梵語和俄語的相似”（О сходстве санскри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русским）一書就是一例。在這一類的著作中還談不到制訂一些正確的有根據的標準來確定語言的親屬關係和斷定所比較的許多語言共同具有的某些個別語言現象的原始形式，因此，對於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來說，這些著作的意義有限，就是只收集了一些對於深入分析和作重要概括時所必需的語言事實。

19 世紀 20 年代的一些語言學著作中才有了歷史比較地研究語言材料的經過嚴格論證的方法和原則。如丹麥的語言學家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所著“古代北方或冰島語言

起源的研究”(Uudersö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 这是 1814 年作者在論文竞赛时發表的, 于 1818 年出版. 德国学者弗朗茨·葆朴 (Franz Bopp) (1791—1867) 所著“論梵語動詞的變化体系与希腊語、拉丁語、波斯語、日尔曼語的動詞变化比較”(Ueber das Conjugation 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1816年出版); 俄国語言学家 А. X. 沃斯托柯夫 (А. X. Востоков) (1781 — 1864) 的著作“論斯拉夫語言 (斯拉夫古文献語法序論)”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славянском языке, служащее введением к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его язы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ой по древнейшим оного письменным памятникам) (1820 年出版) 以及雅柯勃·格里木 (Jacob Grimm) (1785—1863) 的“德語語法”(Deutsche Grammatik), 該書第一卷于 1819 年出版.

这些著作給历史比較語言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些著作一致認為語言的比較应当首先建立在分析語法形式的基础上. 如果它們的語法形式根本上相近, 那么就可以設想这些語言有同族关系. 至于詞彙方面的情况, 如果个别詞之間有对应的关系, 也不能認為是同族关系的可靠証据, 因为这很可能是由于講这种話的民族存在的某个时期借用外来詞的結果. 在确定亲屬語言关系的时候詞彙的对应只有在断定語法詞素 (前綴、后綴、詞尾) 有确切对应的情况下才被作为补充材料来利用, 同时还应当首先利用具有最簡單最古老的意义的根詞. 葆朴、拉斯克、格里木、沃斯托柯夫这几位历史比較語言学最初的代表者在他們的著作中指出必須要对語言的語音方面作詳細的历史的分析, 这一点尤其重要. 在現代語言中詞的語音上的相似可能是不可靠的, 可能是在这些語言發展的过程中后来才产生的, 有时甚至是偶然的巧合. 所以必須要追溯这些个别的音組在一种語言里或一組亲屬語言里長期存在过程中的發展情况. 經過这样的分析, 就能够弄清楚一个語族里或每一种語言里語音变化的一些規律. 历史比較語言学中最重要規則就是要遵循这些規律. 于是在語言学的历史上首先在印欧語系个别語族的語音發展中弄清并确定下了一些規律. 例如拉斯克和格里木确

定了日尔曼語輔音轉移的規律，這一規律起作用的結果使得日尔曼語在印歐語系里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語族。另一方面，根據這個轉移的規律使我們有可能在日尔曼語和印歐語系其他語族的語言的外表不相同的詞和形式中找出它們的同族關係。如德語的 acht (八) 和俄語的 восемь，英語的 water (水) 和俄語的 вода，英語的 father (父親) 和拉丁語的 pater 等等。格里木發現了古高德語輔音轉移的規律，這種輔音的轉移使得高德語具有不同於低德語方言和其他日尔曼語言語音結構的特殊的語音特點。

談到日尔曼語的輔音轉移，必須說明：在阿爾明尼亞語、奧塞丁語、赫特語中也有類似的轉移情況。那麼，在這些特點如此不同的印歐語言中都有這個特殊的語音過程，是否有它共同的原因呢？這個問題在科學中還沒有獲得滿意的解決。

研究語音的規律就能夠把印歐語系中親屬關係更近的語言劃分為一個個的語族，並且能夠確定個別語言發展的分期。例如沃斯托柯夫就確定了斯拉夫語的，特別是俄語的歷史分期。沃斯托柯夫利用他對斯拉夫語的語音結構（至少是對“юс”）光輝的歷史比較分析的成果第一次在斯拉夫語言學的历史上試圖確定斯拉夫各語言相互關係的特點以及各個語言對古斯拉夫文學語言的接近程度，而且有一定的成效。同樣，格里木把歷史-語音的標準作為德語歷史分期的基礎：輔音的第二個間歇使得古高德語從西日尔曼語支中區分出來，古高德語時期的特點首先是非重讀音節完全不發生元音的弱化；在 12 世紀以後的書面文獻上所看到的非重讀元音弱化的情形是劃分中古利德語時期的主要根據；而在 14 世紀的書面文獻上所看到的古二合元音的緊縮和長元音的二合元音化則被認為是近代高德語時期的特點。儘管這種分期法又為後人更仔細地修訂過而使它更加確切，但是歷史-語音標準仍未失掉它的頭等重要性，這並不是偶然的。語言的歷史分期不可能把語言發展的一切方面的情況都同時拿來作根據。因為語言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就必須有它的穩固性，而這種穩固性又是依賴語言各個要素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同時性的。當語言的某一種質處在變化過程中的時候，這種變化就被語言其他質的相對穩定性所均衡，這種變化不會引起語言功能的那怕是最小的中斷，也不會稍許減弱語言的交際力量。比如說，

詞彙中的某一部分有了大量的補充，那麼新詞就加入了旧的很早就已在語言中巩固下來了的詞的行列中去並按照習慣的語法規則組織起來，它們很容易表現出自己的意義而並不使人難於理解，如某種語法的質發生了變化，那麼這種變化的過程是非常緩慢的，而且是按照逐漸地改變旧質的意義的途徑進行的，同時語法的其他的質仍處於穩定的狀態，正因為如此，新出現的東西才不致於破壞交際的功能。

正因為語法的質的發展的這種不劃一性和不同時性，而且這種發展非常緩慢，所以語法的標準對於語言史的分期來說幾乎是完全不適用的。

必須說明，由於某些語言的發展有其特點，所以在對這些語言進行分期時有時也利用語法標準，例如，從古伊朗語過渡到中古伊朗語的狀況，就是以語法特徵為其特點的。詞尾變化的破壞以及語法關係的表達法從綜合走向分析，然而，這些語法變化的起源仍是語音的因素：詞形變化成分在語音上的瓦解，這種情況在日爾曼語的材料中特別明顯。

詞彙的標準也是不適合的，因為在語言存在的一切時期詞彙的增長都是相當迅速的，而且沒有明顯的依據點來對語言的發展進行分期，更不能把社會結構拿來作為語言歷史分期的標準，因為語言的語法和語音結構中的變化並不依賴於社會制度的更替。

這樣看來，只有貫穿著整個語言的一切詞，一切形式的語音變化才能在延續一個相當的時間以後使語言具有一些為研究者易於察覺的新特點。這些涉及到廣泛語言材料的語音變化造成了許多標誌，它們有助於語言學家區分語言發展中的各個時期，處在兩個大的變化之間的語言狀況可以作為一個統一的整体來研究，來描寫，並且可以假定為語言發展中的一個階梯。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創造者們的特點是力圖提出異常重要的語言學問題並且力圖勇敢地廣泛地概括語言事實。許多他們所解決了的問題又被後代的語言學家們所推翻了，而有許多問題牢固地進入了學科之中，成了語言科學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沃斯托柯夫在他 1831 年出版的“俄語語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中勇敢地擺脫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研究語法現象的形式邏輯的公式。沃斯托柯夫詳細

地研究并仔細地比較了不同的口語和文學語言中的語言形式，廣泛地運用民間的活的口語的事實，同時也不忽視同族語的材料，因而在句法學的历史上第一個斷定：俄語中雙成分的句子結構占優勢，這是俄語的特點。這個事實在句法方面是個很重要的發現，因為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观点是認為任何語言中的任何句子都和邏輯的判斷相適應，永遠具有三個成分，就是：主詞——述詞——系詞。例如和沃斯托柯夫同時的當代最大的比較語言學家弗朗茨·葆朴花了很多的精力來証明沒有動詞—系詞的句子一般是不存在的。葆朴不顧語言事實而提出這樣一個理論，認為每個動詞不管是隱蔽的形式還是開放的形式都包含有表示存在的動詞的因素，但想在每個動詞之中發現動詞 *быть* 的因素，這種企圖自然是不成功的。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大多數動詞中都有省略的緣故。

沃斯托柯夫的句法观点對於後來研究俄語句法的學者們發生了很大的影響。B. B.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對於沃斯托柯夫的句子雙成分學說給了很高的評價，他正確地指出：“對於俄語中最常用的雙成分句或“雙語部”句的結構的新的理解是和 A. X. 沃斯托柯夫的名字分不開的。這種關於句子結構的新观点不能不反映在對於動詞範疇、形容詞的短尾形式以及謂語副詞的一般的解釋上面。”^①

這樣看來，正確地理解句子的結構對於研究許多非常重要的語法部分有着巨大的意義。

黏着理論的研究也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先輩們的一件大功績。這一理論是和弗朗茨·葆朴的名字分不開的。他的名作“梵語、曾德語、阿爾明尼亞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古斯拉夫語、俄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 Send, Armenischen,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auischen, Altslawischen, Gothischen und Deutschen) 一書從 1833 年開始出版，到第三版的時候裝訂成三大巨冊。在這部書里葆朴給自己提出了一項

① 維諾格拉多夫：《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А. X. Востокова и их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見《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第 10 卷第 2 期, 第 121 頁, 1951 年 2 月出版。

異常困難的任務，就是利用比較的材料和對親屬語言進行比較來確定語法形式的起源。

葆朴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就不能夠死守着舊的、缺乏根據的理論：詞根的內部變化是詞尾的唯一起源。葆朴第一個提出這種思想：外部的詞尾，如果溯其起源，在某個時期它曾經是一個獨立的詞。這一思想對於語言學的研究，對於確定每個語法詞尾的發展情況是一種強大的推動力。葆朴本人極感興趣地着手解決名詞變格詞尾和動詞人稱詞尾的起源問題。他試圖證明詞尾主要起源於代詞。

葆朴的理論是這樣的：任何語法形式的產生都是由於兩個獨立的詞複合的結果，其中一個詞由於處於非重讀的地位而和另外一個詞結合在一起並且逐漸喪失了它的詞彙意義，而這又促進了外形的變化、簡縮。這個理論在以後的語言學家中間獲得了許多人的擁護，然而到19世紀末葉對於這個理論又提出了許多懷疑的意見。特別是新語法學派的代表者之一卡爾·勃魯格曼 (Karl Brugmann) 斷然主張印歐語言中的詞尾起源問題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不必要提出來研究。這種認為不可能解決有關起源問題的悲觀主義論調是19世紀末葉語言學中的基本特點。然而到了20世紀語言學家們又重新回到了使人發生興趣的語言個別質的起源問題上來。許多語言學家又重新來研究葆朴的詞的複合理論，使它更具體、更確切；而另一些語言學家則試圖對詞尾變化的起源給予新的解釋。這些新的解釋就是所謂“局部化理論”(теория локализации)。根據這種理論，詞尾的構成是利用了個別詞的一部分，這種詞具有作為相應意義的語法范疇的特點的某種意義。可以舉出德語中複數的後綴 -er 的歷史作為“局部化理論”的典型例子(比較 Kind (兒童), Kinder (兒童們))。最初，後綴 -er 並不是複數的標誌，而是為數不多的一些中性的詞的詞身的一部分。由於某種內部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在用於單數第一和第四格的時候這一部分脫落了，這就促使了這個部分區分出來成為複數的形式要素，並且在最初與它毫無關係的詞(即該詞的構造原不包括這個成分)也可以加上這個要素了。

應當指出，無論是詞的複合理論還是局部化理論都能够在事實材料中找到證明。這就說明詞尾變化的構成過程是一個複雜和多方面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錯着几种發展的道路，所以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应当找出它的特殊的构成方法。

19 世紀上半世紀語言學上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創立了历史語法。在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雅柯勃·格里木，他是第一部个别語言历史語法的編者。

格里木的历史語法思想在 19 世紀中葉著名的俄罗斯語言學家們如 布斯拉也夫 (Ф. И. Буслаев) (1818—1897) 和 斯列茲涅夫斯基 (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1812—1880) 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反应，然而这些思想在他們的实际研究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改变，再往后發展就形成了独立的学派。

布斯拉也夫著有“俄語历史語法”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一書，該書于 1858 年出版。在这本書里作者不但广泛地利用了历史的方法，而且也非常注意語法形式的意义内容，这是比格里木的“德語語法”好的地方，在格里木的書里語言現象的意义方面很少談到。

布斯拉也夫支持格里木的理論，認為具体語言历史必須要創造这种語言并在史前和有史时期的許多世紀中作为交际工具来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联系起来研究。布斯拉也夫不但对俄語文学語言作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历史分析，而且对民間的口头創作及与之有关的問題也进行了研究。在語言學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必需研究方言和土語的就是布斯拉也夫，这对于俄語方言學的發展是一个推动力量。布斯拉也夫在他的“俄語历史語法探討”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一書中写道：“語言學家在沒有人研究过的語言里，甚至在粗魯的地域方言里能够給自己的求知慾找到与經典文艺作品一样的滋養料。对他說来，最不开化的民族的語言就是精神世界的高貴的作品。”^①

布斯拉也夫也比格里木更加正确地解決了語言的本質和語言的發展問題。格里木認為語言不是在發展，而是在后退、在退化。他引用日尔曼語作例子，古日尔曼語拥有丰富和多样化的詞尾变化，而現代日

① 見該書第 14 頁。

尔曼語中这种丰富和多样化的詞尾变化已經消失了。布斯拉也夫的观点是与格里木的語言退化思想不相同的。布斯拉也夫在人民历史發展中看到了进步，同时把語言的历史与人民的历史联系起来，于是断定語言發展也是进步性的。他同样也了解語言交际职能的意义以及語言在其發展中記錄人类思维成果这一特点。在上面提过的“俄語历史語法探討”一書的序言里，布斯拉也夫写道：“这門科学（指語言学——本文作者按）不仅把詞看成是互相交流思想的手段，而且看成是人民精神生活的文献，同时是最古老的文献。它的历史在人类智慧的發展史中占着首要地位。”^①

布斯拉也夫的这些思想，超过了后来西方资产阶級語言学的各个派別，并且在俄語語言学思想的發展上留下了可貴的痕跡。

斯列茲涅夫斯基也是 19 世紀俄国語言学界的一个傑出的人材，是最大的古文字学家之一。他研究了大量的古斯拉夫語的和古俄語的文字文献。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作了許多有趣而且在当时是最广泛的概括，大部分都包括在他那本理論著作“关于俄語史的意见”（Мысли об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里。該書于 1849 年出版，共印了两版。在这本書里斯列茲涅夫斯基写道：“語言的历史是和人民的历史分不开的，应当把它列入人文科学，而且是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斯列茲涅夫斯基对詞彙特別注意。詞彙是語言中最不穩定的部分，在他的發展中反映着人民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現象和变革。他写道：“对于历史学家說来，每一个詞就是生活的見證、文献和事实。”

这些話使我們完全了解了斯列茲涅夫斯基特別注意研究古俄語詞彙的原因。他的研究成果都收集在“古俄語詞典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这部三卷集的書中。这部書是在他逝世以后才出版的。直到今天，这部書仍然是唯一的一部系統地研究古俄語詞彙的書。

从上面看来，历史比較語言学产生和發展的时代是語言科学中具有丰富的思想和广泛地概括的时代。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又开始了另一个时代，这就是細心地搜集語言事实并仔細地分析和研究語言的

① 見該書第 18 頁。

語音結構和語法構造的細節，而从不提出大的起源方面的問題的时代。語言學史上這個新的轉變鮮明地表現在所謂“新語法學派”之中。

在新語法學派出現以前，語言學史上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就是所謂比較語言學第二代代表人物的活動時期。這一代最突出的語言學家就是德國語言學家奧古斯特·施萊赫爾 (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他是語言學中所謂自然主義學派的奠基人。這個自然主義學派把語言看成是生物機體或是生物機能，這是和俄國語言學殊異的，它純粹是外國語言學思想的產物，主要是德國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階段。

在葆朴和格里木的著作里已經看到了語言學的自然主義的萌芽，但是關於語言本質的自覺的、有系統的自然主義的主張還是由施萊赫爾首先發展起來的。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對於施萊赫爾有着巨大的影響，此外，他不但從事語言形式和現象的研究和分析，而且也從事植物學的研究。施萊赫爾關於語言的特點和本質規定了三條基本原理：

一、語言是一種自然機體，並且和自然界所有機體一樣按照同樣的規律生存着。

二、因而語言學應當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

三、研究語言的方法也應當和研究植物、動物等的方法一樣，就是說要用自然主義的方法。

我們沒有必要花太多的時間來闡明對於語言本質的自然主義的理解的不正確性和沒有科學根據，因為這是最明顯不過的事。語言脫離了人類社會是不可能產生的。社會是把語言作為勞動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交際工具而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比較詳細地來研究一下施萊赫爾的其他理論性原理。

施萊赫爾認為語言有兩個重要的要素，就是：意義和關係。這兩個要素使得語言有可能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施萊赫爾把這兩個要素分配給不同的語言成分。意義是詞根所具有的，而關係則包括在構詞的和構形的成分中。因此，施萊赫爾根據語言基本要素（意義和關係）相互關係的性質把所有的語言分為三組。

第一組是孤立語。在這種語言中意義是唯一的要素，所以這種語言只有詞根。

第二組是黏着語。在這種語言中關係要素是加在意義要素上的。

第三組是屈折語。關係要素和意義要素構成了一個統一體。

施萊赫爾認為這三種語言類型構成了語言發展的三個時期，他這樣寫道：“一切比較複雜的語言形式都來源於比較簡單的語言形式，語言的黏着形式產生於孤立形式，而屈折形式又產生於黏着形式。”^①

施萊赫爾把語言的這三種類型看成是有機生長的三個階段。他認為孤立語是語言的童年，黏着語是語言的成年和壯年時期，而屈折語則認為是語言的沒落狀態，是語言的衰老時期。

這樣，從施萊赫爾的觀點看來，語言沒有發展史，而有的只是生物式的生長。也就是說，只有植物和動物式的發展，而不是社會現象式的發展。這樣地理解語言的本質必然得出了施萊赫爾的印歐語言譜系樹的理論。施萊赫爾極力把語言與植物界相比擬，於是把印歐語系看作似乎是一棵樹，在初期只是一個樹干，到後來就分出許多枝。母語樹上的各個枝杈就是受共同的根所滋養的語言。同時，施萊赫爾提出了一條原理，就是在比較兩種語言的時候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在它們之中找出一個原始形式：或者它們之中的一個是另一個的母語，或者是在兩種語言材料的基礎上重建出它們共同的母語。下一個時期的語言學選用了第二種方法來建立所謂“基礎語言”。

提出反對語言的譜系樹理論的是自然主義學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約翰·史密特 (Johann Schmidt)，他到後來成了新語法學派的著名人物之一。在“印度日爾曼語中的親屬關係” (Р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индогерм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 一書 (1827年) 中約翰·史密特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所有印歐語系的語言從最初萌芽的時候開始就是作為方言而存在的。他所反對的基本上是認為語言分化起源於統一的母語分成幾個獨立的語言的這種觀點。約翰·史密特企圖用活的方言材料來證明新的語言的質是以政治上聯結起來的語言地域為中

① A. 施萊赫爾: K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2. Auflage, S. 4.

心波浪式地扩散开来的。史密特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結論說，現代的印欧語系的各个語族（如斯拉夫語族、日尔曼語族、居尔特語族等）在共同印欧語中是作为它的方言存在的。为了說明自己假設的正确，史密特認為最主要的証据之一就是这样一事实：一切有書面文獻記載的印欧語系的語言分成兩組，一組叫 «кентум»，一組叫 «сатем» (ш)，也就是根据有无顎化的 к 和它的变体而分成的。根据这个理論，屬於 «сатем» 組的語言的新質的波浪以亞洲为起点向外扩展，而屬於 «кентум» 組的語言特点的波浪則以欧洲作为波浪式的移动的園地。

史密特的“波浪論”(теория волн) 在印欧語言学中是很受欢迎的，一直到有了新的、对語言学的發展說來是划时代的發現为止。这就是在 19 世紀末發現并解讀了赫特語和 20 世紀初發現并解釋了吐火羅語的两种方言。这两种死的印欧語言的發現完全推翻了史密特“波浪論”的主要論据。因为小亞細亞的赫特語和新疆的吐火羅語并不像預期的亞細亞地区的語言所应当具有的 «сатем» 的特点，而是具有 «кентум» 的特点。这样看来，不能說 «кентум» 語的波浪扩展的中心是在欧洲。同样也不可能再保留过去的說法，認為斯拉夫語和波羅的語是波浪的邊緣，它們虽然位于欧洲，但它們是 «сатем» 組的語言。至于阿尔巴尼亞語，也是屬於 «сатем» 組的，但即使从前也很难說它是欧洲的邊緣。所有这些，就使得必須立刻徹底地重新审查主張在印欧語系的範圍內把語言分成兩組的那些陈旧的理論。

所有現代的語言學家——印欧語言学的專家們一致反对这条原理，即反对認為印欧語系的語言分为 «кентум» 和 «сатем» 兩組是由于“原始”的印欧民族地域上的区分而造成第一次划分。許多學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說：个别印欧語言中顎化舌根塞音的中斷是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的，并且是彼此不相依賴的。

無論是施萊赫爾的語系樹理論，还是史密特的波浪理論对于語言学的發展都有过很大的影响，但这两种理論的原始形式現在已經沒有人信仰了。对于印欧語系的語言的多样性的权威解釋是三种理論的綜合，即上述两种理論再加上“底層理論”(теория субстрата)。根据这种底層理論的說法，語言的多样性是由于在語言交融过程中战敗的語言影响战胜的語言的結果。

語言學中的自然主義學派特別提倡“母語”(прямой язык) 這個名詞並且極力推廣所謂母語理論。為了反對這種理論我們提出下面幾點意見。

某些具體語言有親屬關係是無可爭論的事實。但是語言的這種親屬關係是由於某些民族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這些語言本身生物式的發展的結果或某個種族生物式的發展的結果。

講着親屬語言的各個民族可能根本就屬於完全不同的種族。由於長期間政治和經濟上有着緊密的關係的結果，人種上沒有親屬關係的部落或部族可能逐漸地（在語言交融過程中）開始講親屬語言。儘管它們最初就沒有血緣關係。

如我們在施萊赫爾的著作中所見到的那樣，自然主義對語言本質的解釋過於簡單化了。當然，它的成就最不可能長久的。代替他的是在選擇與生物比較時更加細緻、更加小心的 M. 繆勒 (M. Müller) (1828—1900) 的理論。M. 繆勒對語言的生物學主張作了許多修正，而原封未動地保留了它的本質。例如，M. 繆勒不說“語言是生物機體”而用了更加諛婉的說法“語言是一種有機的活動。”或者說：“語言是機體必需的功能。”

M. 繆勒提出他自己的論證，把“語文學”(филология) 同語言學劃分開來。繆勒一方面把“語文學”看作是研究書面文獻的科學而保留了这个術語的內容，同時把它列入了歷史科學；他把語言學當作自然-歷史科學，研究語言的生物式的發展。這種發展不依賴於講話人的意志，而是依賴於講話人的種族特點。由於把語文學和語言學作了這樣的劃分，繆勒就給予方言以特殊的意義，把方言看作語言生命的真正承擔者，因此它有權利成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繆勒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研究方言的人。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俄國的語言學家布斯拉也夫。然而，由於繆勒的許多實際上只是平平常常的著作，特別是他的“語言科學”(Наука о языке) 一書（俄譯本 1865 年出版）傳播得相當廣。這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語言學中的一個新部門——方言學的形成。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認為自然主義對語言學有某些貢獻，那就是它承認了研究沒有文字記載的活的語言，研究方言有着特殊的價值。

自然主义学派在语言学思想的发展中的意义就止于此。诚然，这个学派的一些个别代表人物对于科学有一些个人的功绩。但是这只是在他们研究或整理语言事实本身，而不是一般论证他们的整个理论的时候才有的。这主要是指约翰·史密斯，他到后来成了语言的新语法学说的拥护者，也是指自然主义学派的奠基者奥古斯特·施莱赫尔本人。随后而起的语言学的一个派别——新语法学派对于施莱赫尔在语言学上活动的成果给了一个较为正确的评价。新语法学派的学者们指出，在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面施莱赫尔没有什么正确的和有成效的思想，但是他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却作了巨大而有益的工作。施莱赫尔整理了科学上所积累起来的语言材料并且正确地指出了这个材料中的空白点。特别是他结束了对梵语的地位和作用评价过高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却是他以前的学者工作中的特点，并且促进了研究科学中很少研究过的语言。施莱赫尔同样也相当地促进了对印欧语系个别语言语音规律的研究工作的发展。

19世纪的下半世纪，语言学坚决地离开了自然主义的立场。施莱赫尔的原理（即主张语言是一种生物机体，因之语言学也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开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家们都力图把语言看成是民族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现，或者看成是个人精神里的一种观念机构。语言学中这种目的明确的心理学派的基础是由德国的史坦塔尔(H. Steinthal (1823--1899)和俄国的波铁布尼亚(А. А. Потебня) (1835—1891) 奠定起来的。

史坦塔尔提出了这样一条与语言本质的生物学观点迥然不同的原理，就是语言发展中的一切现象都和某一民族的观念有关，并且是该民族的心理表现。词和语法形式的一切意义都是逻辑范畴在民族精神里经过主观加工的产物。这种民族心理规定了语言的内部形式，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它就是语言的内部形式。史坦塔尔在他的著作“W. 洪堡特的语言学著作” (Die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Werke W. von Humboldt) (1848) “语言结构重要类型概说” (Charakteristik des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s) (1860) 中，特别是在“从科学上的最新成就看语言的起源” (Der Ursprung der Sprache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letzten Fragen alles

Wissens) (1888) 一書中發揮了這些思想。

史坦塔爾的基本思想是在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所謂“語言哲學”的奠基人威廉·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的直接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洪堡特是葆朴和格里木同時代的人，但根據他的語言學觀點來看，他卻是屬於后一時期的語言學家。對於他同時代的人來說，他並沒有發生什麼重要影響。在語言學中洪堡特特別是以他的著作“爪哇島卡維語研究” (Ue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va) 一書而著名的。這本書的序言題目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智力發展的影響。” (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洪堡特是康德和費希特的信徒，這在他的語言學著作中有顯著的表現。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指出洪堡特語言學思想有一定價值的同时，對於洪堡特的唯心主義方法論和局限性作了中肯的說明。車爾尼雪夫斯基堅決反擊了洪堡特認為語言結構決定民族的文化水平的看法。

車爾尼雪夫斯基、柏林維基、杜勃羅留波夫對於語言和人民的聯繫問題都很感興趣。對語言本質的自然主義和種族主義觀點是當時國外語言學的特點，而在俄國就沒有得到傳播，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革命民主主義者。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在自己的文學學著作中，在對語文學和民間文學的評論文章中以及在直接闡述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經常強調語言的人民性，經常強調這樣一個事實：語言是一個民族的全民財產，一種語言無論它具有那種類型的語法構造都完全能夠滿足處於高度社會發展水平的人民對於交際手段和思維工具的要求。

在語言學中，洪堡特第一個提出了語言內部形式這一著名的理論。然而洪堡特的推論過程並不十分清楚，前後也不一致，以致於他的每一個追隨者對於這個理論都各有各的理解。最突出的，例如，波鐵布尼亞一個人在他的著作中對內的內部形式這個理論就有三種說法。

波鐵布尼亞是俄國心理學派的奠基人，1862年波鐵布尼亞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書名為“思想和語言” (Мысль и язык)。在這部著作中，他的觀點和洪堡特，特別是和史坦塔爾的思想非常接近，

但对于德國學者們所觸及到的一些問題，他仍有自己的看法。

波鐵布尼亞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把各種關於內部形式的理論作為最重要的問題加以探討，其中最有名的是把“詞的內部形式”看成是“呈現語言以外的內容的方法”，也就是看成個人呈現某一概念的方法。例如，波鐵布尼亞舉出 подснежник（雪花）這個詞作例子，他在分析這個詞的時候得出結論說，關於這種花的概念在俄國人的心理中僅僅和這種花的許多特征中的一個特征有聯繫，這個特征就是：這種花是在雪還沒有完全融化的時候從雪的底下長出來的，подснежник 這個詞的內部形式的基础正是語言以外的關於花的這種特征的概念。這樣看來，波鐵布尼亞發展了洪堡特語言內部形式這一理論的語義方面，這是和波鐵布尼亞的整個主張完全一致的。

在確定了應當怎樣理解“詞的內部形式”這個術語以後，波鐵布尼亞就把詞分為兩組：一組是有內部形式的詞，一組是內部形式已經消失的詞。波鐵布尼亞注意到，失去了內部形式的詞能獲得新的屬性，後者在上下文中呈現其他事物的時候本身又可成為內部形式。例如 рыба（魚）這個詞現在已經沒有內部形式了，但是根據波鐵布尼亞的觀點，當用它來形容一個人的時候，它就成為具有同樣讀音的一個新詞的內部形式，因為波鐵布尼亞不承認詞的多義性，他認為詞的每一個新意義就是一個新的獨立的詞。

由於他發展了詞的內部形式理論的上面所提的這一種說法，因而他把語言的整個發展都看成是內部形式的變化過程，同時他不僅把詞彙單位包括在詞的概念之中，而且把前綴、後綴、詞形變化要素也包括了進去。按照波鐵布尼亞的意見，語言的一切形式都只是意義，在他解釋這些形式的時候就這樣說：從它們出現的時候起，以及在語言的一切時期它們就是意義而不是音。^① 關於這一點，波鐵布尼亞一方面把物質的聲音外壳與概念割裂開來，而同時又把意義本身看成是一種個人的觀念活動，它只有在個人的句子上下文里才會有，離開了這個上下文就不存在。

由於波鐵布尼亞把詞和語法形式僅僅看成是意義，聲音物質對於

① 參看 А. А. 波鐵布尼亞：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 1, Харьков, 1899, 52 頁。

意义來說乃是次要的，非本質的因素，從而他把語言和思惟混淆起來了，尽管這並不是他的目的和希望，這種語言和思惟的唯心主義的混淆現象自覺與不自覺地把波鐵布尼亞引上了否定詞和語法現象能有多義性的道路。既然一個詞僅僅是意義，而且又是一個意義，那麼意義中的每個新的色彩就已經是一個新詞、新的語法形式，這樣看來，根據波鐵布尼亞的意見，語言中充滿了同音詞，而且正是同音現象構成了語言的本質和特點。

語言中充斥着同音現象的論點，語言中似乎沒有詞的多義現象的論點，是從波鐵布尼亞的總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主張中自然而然地得出來的。他主張詞是不可能重複的個人的創作行為。波鐵布尼亞說：“甚至當我們直接表演，比如說，如何用鋼筆寫字的時候也不能表達出什麼意思，我們不過是啓發別人，給別人造成一種獲得印象的情況，這種印象是通過內部的，幾乎是不可捉摸的途徑在行為中表現出來的，要表達詞的意思當然就更為不可能了。”^①

波鐵布尼亞這一缺乏科學根據的論斷是建立在費德的不可知論的基礎上的。波鐵布尼亞的整個語言觀點里都貫穿着關於講話的真正內容的不可認識性的荒謬思想。

在“思想和語言”這部作品中波鐵布尼亞寫道：“的確，靠詞的幫助而理解到的內容只不過是個假定數，如果你對於詞所想的就是另一個人所想的，那麼你就不再是你自己，而成了那個另外的人了。所以，了解別人（按“了解”這個詞的一般意義來說）只是一種幻覺，就象認為我們所看到的、所觸到的等等都是物本身而不是自己的印象一樣的幻覺。但是應當補充說明：我們的全部內在生活就是建築在這個神聖的幻覺上的。”^②

這種關於詞的無重複性、關於詞義的不可表達性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前提就是主張語言的絕對同音性、主張同音現象是語言的主要特點的這一理論的基礎。以意義的不可表達性的說法為基礎的一切語言發展的同音現象的理論都毫無疑問是荒謬的。因為這等於取消了語言在該

① А. А. 波鐵布尼亞: Мысль и язык, Харьков, 1913, 184 185 頁.

② 同前註, 110—111 頁.

語言集体之内对所积疊起来的經驗的繼承性，沒有这种繼承性語言就不可能在該語言集体的成員之間起交际工具的作用。

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語言是为了滿足社会上对交际工具的需要而产生和發展起来的。这样的語言，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需要一定的發展形式，这些形式要能够在創造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整个生活中保證它能为大家所了解并且具有完全的穩固性，这样的形式就是抽象化和概括化。这就使得有可能一方面可以多次地利用同一个音組来称呼同一类型的各个事物和各个現象，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同一个音組形成新的名称去称呼与这一类型的各个事物和現象的某个或某些特征相同的另一类型的各个事物和現象。詞所具有的这种扩充自己的意义範圍的能力使得建立語言的基本詞彙有了可能，而基本詞彙則是語言作为活的交际工具長期存在所必需的。

由于不理解語言中抽象化和概括化的社会本質，波鉄布尼亞企圖确定一切語言都必須經過的語言發展的阶段。波鉄布尼亞企圖把語法构造的發展分为两个阶段，并且，根据波鉄布尼亞的意見，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特殊的規律。正因为波鉄布尼亞認為語言只不过是意义，所以在他确定語言發展阶段的时候是以企圖把思维的發展也分为阶段为出發点的。按照波鉄布尼亞的意見，在第一个阶段思维是具体形象思维，事物的屬性、特点和动作不能抽象地思考，不能把它們从其所附的事物上抽象出来。波鉄布尼亞写道：“名詞就是某一特点及其事物（这个事物还有許多其他的特点）一起的名称（原始的）。它接近于感觉形象（这种形象可以指示出来并且多少可以描繪出来），所以它比形容詞更原始一些。形容詞是不跟事物在一起的特点的名称。这是指示不出来的，并且完全描繪不出来的。同样，行为本身也是不能指示出来和描繪出来的。上面所說的意見同下面的說法是类似的：作为有形式以前的詞的詞根是不可能具有像 *рыть*（掘）、*плетти*（編）、*то-лочь*（搗碎）等等在原始動詞的已經抽象了的意义的基础上所得到的那种意义，这些詞根既不能是動詞也不能是 *nom. actionis...* 即虛設的主体的行为的名称。”^①

① А. А. 波鉄布尼亞: 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 III, 73 頁。

这样看来，按照波鉄布尼亞的意見，語言發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詞尚未具备形式的阶段，也就是还没有語法形式的阶段。这时候，一切未具备形式的詞似乎都是事物和行为者的名称。

根据波鉄布尼亞的主張，在語言一般發展的第二个阶段思维才有了把事物的屬性和特征抽象出来的能力，同时形成了現代的詞类：名詞、形容詞、動詞等等。波鉄布尼亞認為，所有的詞类都是由行为者的名称抽象出来的。

波鉄布尼亞的整个阶段理論是建筑在对思维和語言的實質的不正确的理解上的。認為思维沒有声音物質的体现也可以存在的观点是錯誤的。抽象化和概括化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沒有概括和抽象的思维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語言一出現，抽象化和概括化的过程也就同时出現了。語言和思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辯証的統一體。当然就談不到什么沒有思维的抽象行为和概括行为等过程存在的語言阶段。只有站在主觀唯心主义的立場上否定語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社会本質才可能設想出这样的阶段。

正像我們上面所談到的，波鉄布尼亞特別重視語言学的一般問題，尤其是像构成所謂“語言哲学”的內容的那些問題，如，語言及其个别要素的产生和發展問題，語言中思想和感性知覺的相互关系問題，形式和意义的相互关系問題等。

但是，波鉄布尼亞的語言学活动的意义不在于提出和企圖解决这些問題，因为波鉄布尼亞主觀唯心主义地对待語言現象，他不可能在这些問題上对科学的發展有什么貢獻。他的普通語言学观点之所以在科学上站不住脚，是因为他不理解語言的社会本質，不了解語言的产生是为了滿足人类社会需要交际工具来協調共同的劳动活动的要求。既然語言是为了在劳动中互相交际而由人們創造出来的，那么这种語言就不可能是个别人創造的，而只能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整个語言集体所共同創造的。此外，个人不必再来从头創造語言，而只是利用以前已有的現成的語言。否則，人类社会就不得不停止發展。

波鉄布尼亞对于俄国語言学思想發展的意义在于他大量收集并且細致地分析了語言事实，作出了一些有趣的局部性的概括，从而丰富了語言科学。一个学者，即使他站在錯誤的方法論的立場上，但他对

新的事实材料所作的概括工作和直接从观察語言事实所得出的結論也永远是有积极意义的。

波鉄布尼亞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对于确定个别語法范畴历史發展的綫索和詞义發展的綫索感到極大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波鉄布尼亞目的明确地指出了語言的前进發展、語言形式的愈趨完善，詞彙語义的愈益丰富。波鉄布尼亞的一部主要著作“俄語語法札記” (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由于具有丰富的事实材料以及作者历史地分析語言事实的熟練的技巧，到現在仍未失掉它的意义。这部書和从前一样地激动着語言学家們，推动他們創造性地探索新的事实以及解釋这些事实的新途径。

尽管波鉄布尼亞有大量的著作，但他在俄国語言学中並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學派。語言学家中間也只有奧夫先尼柯-庫利柯夫斯基 (Д. Н. Овсян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是他的追隨者。奧夫先尼柯-庫利柯夫斯基曾試圖把波鉄布尼亞在斯拉夫語 (主要是东斯拉夫語) 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些結論推广到古印欧語言上去。然而他的这种企圖并沒得到什么人的贊成。并且他本人作为文艺学家和批評家的名望比作为語言学家的名望要大。

* * *

19 世紀 70 年代在心理學派的內部出現了一个历史比較語言学的新學派，語言學史上称之为“新語法學派” (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这个學派作为語言學中的一个特殊的方向首先是在德国形成起来的。它包括当时的这样一些大語言學家，如約翰·史密特 (1843—1901)、赫爾曼·奧斯脫霍夫 (Hermann Osthoff) (1847—1909)、卡尔·勃魯格曼 (1847—1919)、別爾圖爾德·德爾勃呂克 (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赫爾曼·保羅 (Hermann Paul) (1846—1921) 等。在俄国新語法學派有它自己知名的代表人物，即菲利浦·費得羅維奇·福爾圖拿托夫 (Филипп Федорович Фортунатов) (1848—1914) 和他的學生阿列克賽·亞歷山大洛維奇·沙赫馬托夫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ахматов) 院士 (1864—1920)；丹麥著名的新語法學家是卡尔·維爾涅爾 (Karl Verner) (1846—1896)；在法國是米舍爾·勃列阿爾 (Michel Bréal) (1832—1916)；

在意大利是阿斯柯里 (Graziadio Isaia Ascoli) (1829—1907); 在美国是惠·特尼 (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 等等。

这些語言学家，人們也称他們为历史比較語言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他們自称为新語法学者，以表明他們所持的理論观点与他們的先行者們有原則上的不同。他們和前几代的語言学家們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他們自覺地拒絕提出普通語言学的問題，拒絕提出与史前时期的沒有文字記載的語言状况有关的理論。

新語法学者把語言看成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并指出必需从历史上去研究它。強調語言現象的历史主义是語言的新語法學說中的積極因素。但对历史主义所作的心理主义的解釋，降低了它的科学价值。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萊比錫新語法學派的領袖赫尔曼·保罗的言論。保罗在他的“語言史的原則”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一書中写道：“心理因素是整个文化發展中最本質的因素，是在任何地方都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所以心理学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①

新語法学者的心理主义带有个人主义的性質。他們認為个人的精神世界是語言的基礎。然而新語法学者要求在研究語言史的时候不仅要考慮心理学的因素，而且也要考慮物理学的因素。保罗認為，把永远是由个人造成的語言形式傳達給別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屬於物理学因素的。这些物理的因素使語言有可能走出个人內部生活的範圍。关于这一点，保罗認為在这方面語言的發展和有机界的發展非常接近。保罗說，在表达新的語言成就的过程中可以說是用特別的形式完成了一种新陳代謝，这就使得可以在个人的生活範圍以外保存着語言的生命。但是，按照保罗的意見，从这里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談什么民族的心理、民族的語言等等。相反，保罗斷定說：“我們不应当忽略：一切純心理的相互作用是在个人內部才有的。人們之間的交际只不过是間接的，是通过物理学的途徑來實現的。”^②

后来保罗發展了这样的思想：每一个人首先要不依賴其他的人自己形成观念、联想等。如果他需要告訴另外一个人他所想的是什么，

① 赫尔曼·保罗：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Halle, 1909. 5. Auflage, S. 6.

② 同前註，12 頁。

那么就需要运用物理的产物即語言的声音，个人的观念和思想本身在同别人交际以前是不需要物理形式的，这里充分表现出了新語法学者对于語言和思维相互关系的唯心主义的理解，因为他们把語言理解成个人心灵中的观念和思想的总和，似乎只有当与别人交际的时候才需要它們的物质形式。

保罗把个人的語言活动划分为心理的和物理的，并且強調指出心理的因素占着优势，所以，照保罗的意見，在研究語言史的时候只需要研究两个方面：首先研究作为語言基础的个人心理特点，其次才是声音的生理学即語音学，語言發展的心理学形式就是类推的規律，物理学形式就是語音規律，保罗肯定說，一个人在最初开始他的語言活动的时候是在他自己的心里，不依賴別人的語言經驗，所以每一个語言活动都沒有历史，个人的这些沒有历史的語言活动就是唯一的語言现实。

然而，与此相矛盾，保罗和其他新語法学者一样，不承認語言事实有静态分析的可能，他断定說，我們无论怎样研究語言，总得要涉及到整个的語言历史，或一个語言事实的历史，例如，比較一个詞的各个不同的意义以确定它們之間哪一个是基本意义或者弄清有什么意义現在已經消失了，这一比較的結果就将是确定历史事实，比較亲屬語言，其目的也是为了确定历史事实；在亲屬形式中研究語音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应当作为历史事实来研究語音的变化。

尽管新語法学者对于語言本質的观点是極其唯心的，但在研究具体語言事实方面仍有巨大的成就，他們在印欧語言历史語音方面所获得的成績特別大，因为分析語言的語音方面是新語法学派工作計劃中的基本要求，他們成功地确定每一組同族語的内部語音变化的規律性，他們把这些規律称之为“語音規律”，但是，他們夸大了这些語音規律的絕對性，他們說，語音規律就像在自然界看到的情形一样，带着盲目的必然性起着作用。

他們之所以把語音規律的作用看成是絕對的，是由于他們認為語音的發展是內在的，除了詞中的語音环境以外，不依賴于任何其他因素，新語法学者完全忽略了語言体系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也忽略了外部影响，如其他語言或方言的影响、書写傳統的影响等等可能性。

上面已經說過，有一些著名的俄國語言學家也是與新語法學派接近的。以優秀的語言學家福爾圖拿托夫為首的所謂歷史比較語言學莫斯科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就帶有鮮明的新語法學派的特點。福爾圖拿托夫也把語言看成是個人的心理物理活動，它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福爾圖拿托夫認為，作為一種心理物理現象的語言的這些變化有兩個方向：一方面是物理學的變化，是通過語音規律的形式發生的，這些語音規律是內在地表現出來和起着作用，並具有絕對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是心理學的變化，通過按類推來創造新因素的形式發生的。

福爾圖拿托夫是完善地掌握了歷史比較分析藝術的一位語言學家。在印歐語言學中，關於各印歐語言重音的相互關係這一重要的語音規律的發現要歸功於福爾圖拿托夫。他根據波羅的語和斯拉夫語的材料斷定在某些印歐語言里有兩種形式的長度：一種是延續長度，一種是斷續長度。由於有這兩種長度，就有了兩種類型的重音。福爾圖拿托夫指出，延續長度的音節總是把重音從它前面的短音節和斷續長度的音節上移到自己身上來。福爾圖拿托夫發現的這個重音規律說明了例如在俄語中 *рука* 這個詞複數的時候重音從最後一個音節移到第一個音節而成 *руки* 的原因。

福爾圖拿托夫關於零詞尾 (*нулевая флексия*) 的原理對於語言學思想的發展也有很大的意義。他提出的零詞尾的概念是使布拉格結構主義學派建立的第一個刺激物。結構主義學派的基础是語言要素在相互對立過程中的功能表現原則 (*принцип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ыявления*)。

與新語法學派接近的還有沙赫馬托夫。他的科學活動，在革命前俄國語言學思想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沙赫馬托夫是福爾圖拿托夫的直接授業學生。這在極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科學研究的方法。他從福爾圖拿托夫那里學會了熟練地運用歷史比較法，這就使他有可能，比如說，重建古俄羅斯編年史的文字，遠至十一世紀。同時，他所重建的已經失傳了的古俄羅斯文字文獻的正確性在許多方面已為後來發現的新的編年史的記載所証實了。

儘管莫斯科新語法學派的學者們和西域的新語法學派的學者有着

同样的唯心主义的基础和抱着同样的目的。但是在某些本質問題上他們之間仍有極大的分歧。莫斯科新語法學派認為在研究語言史的時候不能夠忽視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這是和萊比錫學派不同的地方。福爾圖拿托夫曾經這樣說過：“社會上發生的變化在語言中也伴隨着發生相應的變化。”^①但是，福爾圖拿托夫本人主要是研究印歐語言比較語法問題，所以在他的研究實踐中很少有可能來考慮人民歷史的因素。其後，沙赫馬托夫全力地揭示人民的歷史和語言的歷史之間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寫道：“在自己語言學說體系里，在重建過去的語言的工作中，語言史學家應當在他所研究的人民的歷史中找到固定的依據。語言的生命是和人民生活中的一些現象平行地、相適應地進行的。”^②

這個原則使沙赫馬托夫有可能探討他的研究活動的中心問題，即在語言和文字中所反映出來的俄羅斯民族及其文化的產生和形成問題。由於沙赫馬托夫進行了這樣的工作，所以他的著作不僅對語言學有意義，而且對俄羅斯歷史也有意義。Д. С. 里哈喬夫 (Д. С. Лихачёв) 說得對：“在晚年的作品里沙赫馬托夫簡直是一個第一流的歷史學家，而且他在自己的理論中不僅是利用歷史事實，而且給出關於羅斯的政治生活的新的概念，有時還推翻舊的概念。”

“沙赫馬托夫的著作把羅斯精神生活的複雜性的概念帶進了俄羅斯的歷史學。沙赫馬托夫把編年史的編寫者們的工作看成是大政治家的工作。他清除了那種認為編年史彙集的編寫只具有偶然性的觀點，指出編年史的工作在古羅斯有巨大的意義，一步步地揭開了俄羅斯歷史上的活動家的複雜的細致的政治把戲。”^③

新語法學派對於語言學思想的發展和獲得的成就有很大意義：在

① Ф. 福爾圖拿托夫：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Общий курс.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1901/02 ак. г., Ли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ное издание, 1902, 5 頁。

② А. А. 沙赫馬托夫：Курс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ч. 1, 2 изд., СПб., 1910-1911, 11 頁。

③ Д. С. 里哈喬夫：Шахматов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А. А. Шахматов 1864-1920»,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Н СССР, 1947, 271 頁。

这一学说占统治地位的五十年的过程中它的代表者收集、整理并细致地分析了大批语言事实材料。但是新语法学派在语言学中当它对语言学家们的思想和观点还有着极大的影响的时候就已开始受到了批评。这个批评是从这个学派内部发出来的，而且是站在同样的心理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批评的。被批评的对象自然不是新语法学者们的方法论，而是个别的一些理论原理，特别是对语音规律的解釋以及他们对待语言事实的片面性。

对新语法学派的第一个杰出的批评家是著名俄罗斯语言学家之一伊万·亚历山大洛维奇·鲍都恩·德·库尔特内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1845—1929)。他是俄国语言学喀山学派的领袖。鲍都恩·德·库尔特内虽然和新语法学者们一样仍旧站在个人心理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里就认为必需对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学问题作另外的解釋并用另外的方法去研究它们。鲍都恩的观点受到喀山许多天才的语言学家的支持，像克鲁舍夫斯基 (Крушевский)，保格罗基茨基 (Богородницкий) 等，于是组成了一个统一的論壇。俄罗斯语言学的喀山学派更早地提出了社会学派的领袖瑞士学者索绪尔 (Ferd de Saussure) 的许多基本原理。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对于现代语言学的主要派别之一——结构主义学派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鲍都恩·德·库尔特内在19世纪整个世纪中首次对历史比较法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绝对统治权提出了怀疑，并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静态的描写分析比历史比较法更能够有成效地揭示出具体语言的体系，因为语言体系是语言要素的固定状况。鲍都恩主要反对把语音孤立起来研究，而不考虑它们的体系联系以及在语法形式变化中发音上的变化。鲍都恩·德·库尔特内在1871年就曾经说过：“……语言结构中语音的作用，人民所感觉到的语音的意义，这些意义不是永远和物理学上的音的范畴相吻合的，它们一方面受着生理学的本质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又受着语音的产生、语音的历史的制约。这就是从形态学的、构词法的观点对语音的分析。”^①

① И. 鲍都恩·德·库尔特内: Некоторые общ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и и языке, Спб., 1871, 24 頁.

鮑都恩·德·庫爾特內使克魯舍夫斯基創造的“音位”(фонема)这个術語在科學中牢固地流行起來。他在自己的許多著作中指出：每一個音位都是體現在一系列發音上相近似的音中，這些音在講這種話的人的感覺中是屬於同一個音型的，因為在一個詞的結構中這些發音上的變體是構成同一個詞素的，例如 *вос (воз)* 和 *воза*。這種共同的詞彙——語義意義在講這種話的人的意識中把那些發音上的各種變體聯結成為一個音，為了把這個音和從語言中孤立出來的純粹生理學上的音區別開來，就應當用另外的一個術語來表示它，這個術語就是“音位”。

起初，鮑都恩還是把音位看成語言的物質單位的，但不久他愈來愈把音位理解成心理的東西了。漸漸地他不把音位看成是一個音，而是把它看成音的概念了。鮑都恩這樣寫道：“在我們的心理中經常存在的‘音’（亦即對各種發音動作同時進行的複雜的綜合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各種印象）的概念我們稱之為音位。”^①

關於這方面，我們應當注意到這樣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在鮑都恩敘述關於音位的本質這一問題的過程中，他在作為講話人思想中的概念總和的語言和以這些語言概念為基礎的個人的發音活動之間劃了一條嚴格的界綫。他說道：“語言的聲音作為語言的一個實在要素是純粹的虛構，是科學上的捏造。這是由於概念混淆以及把暫時出現的、一發既逝的東西去代替經常存在的東西所造成的結果。

在個人的心理中存在着並不斷地繼續着語音單位的概念，這種語音單位通常稱為‘語言的音’，發一個音，以及與此聯結在一起的肌肉上的感覺，和由於發音的結果而產生的声响印象，不是別的東西，只不過是在我們心理中存在的相應的聲音概念的符號。”^②

在這段話中我們發現這樣一點，這一點到後來成了索緒爾學說的主要內容，這就是索緒爾關於語言活動的兩個方面的著名理論。這兩個方面就是作為集体的非物質的語言意識的語言和個人的言語。

儘管把音位解釋成為非物質的，心理的因素，但語言中音位構造

① И. А. 鮑都恩·德·庫爾特內: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1912, 13 頁。

② 同前註, 13 頁。

的提出是鮑都恩·德·庫爾特內的偉大發現。他豐富了語言科學並加深了我們對語言體系的認識。鮑都恩學派標誌着語言學發展的一個新的轉折點。

* * *

在 20 世紀初批評新語法學派的是索緒爾 (1857—1913)。他還在新語法學派的立場上寫了他那部優秀的著作“印歐語言中元音的原始體系研究”(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一書之後就已經成名了。該書在 1879 年出版。然而索緒爾只是在他死後由他的學生巴利 (Bally) 和薛施訥 (Sechehay) 把他的講義整理成為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出版以後才享有了世界聲譽。這本書是在 1916 年間問世的。這本書出版以後，索緒爾就成了語言學中社會學派的奠基人和領袖。

社會學派首先批評了新語法學者們的個人主義立場，即把語言理解為個人心理表現的結果。索緒爾和他的學生們把法國學者傑爾格姆 (Дюркгейм) 的唯心主義的社會學學說作為他們的方法論的基礎。這位法國的哲學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的基礎就是集體的的心理體系。它是把個人的心理機械地聯合起來的結果。索緒爾的語言學就是建立在對社會的這種理解上的。所以在解決每個語言學問題的時候在索緒爾的主張中都保留有心理主義並起着重要的作用。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這本書中提出了一般的語言活動這個概念，他稱之為 le langage。按照索緒爾的意見，這個語言活動具有兩個方面：社會方面和個人方面。索緒爾把語言活動的社會方面叫做“語言”(la langue)，把語言活動的個人方面叫做“言語”(la parole)。索緒爾給語言下的定義是這樣的：“...語言只是語言活動的一部分，當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一方面為社會集體所具有的為了實現個人的這一能力所必需的條件的總和。”^①

索緒爾認為個人的言語是“意志和理解的個人行為”。^②

① 索緒爾：Курс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Соцэкгиз, 1933, 34 頁。

② 同前註, 38 頁。

这种“語言”和“言語”的对立是直接从小尔格姆把社会作为机械地联结起来的个人講話的总合的理解中得出来的。索緒尔認為，語言就是反映在社会心理中的个人講話的总合。他說道：“假如我們能够掌握了每个人所积累的一切講話方式的总合，那我們就涉及到了語言这个社会关系。語言是实际言語的宝库，它是在属于同一集体的所有成員之中积累起来的。語言是語法体系，这語法体系潛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或者說得更恰当一点，潛藏在个人的总合的諸头脑之中，因为語言在任何一个入中都不能完整地存在，只有在羣众之中才能完整地存在。”^①

由于索緒尔把語言活动分成“語言”和“言語”，他自然也同样要把語言学分成外部的和内部的。語言活动往往是多种形式和多种体系的，涉及到各个范围和方面，如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历史等方面。这样的語言活动是外部語言学的研究对象。外部語言学包括語言和人种学、历史学以及其他方面有关联的一切因素。索緒尔用内部語言学来和外部語言学相对立。他認為内部語言学对語言学家說来是从事研究活动的真正园地。因为語言体系是它的研究对象。索緒尔說：“語言学唯一的和真正的对象就是把它作为自我存在来研究的語言。”^② 研究語言不应当和分析这种語言的使用者即人民的生活配合起来，因为索緒尔認為“沒有任何必要知道某种語言是在什么条件下發展起来的”。^③

索緒尔的这个主張很明显地表現出了它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基本原理有着原則性的分歧。后者認為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研究語言必需和社会的历史緊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这样进行研究，才能理解語言的特点和語言發展的規律。

索緒尔在提出語言学的研究方法时也是和他的主張一致的。他認為应当把語言看成是自我存在的，好像是一个封閉的穩固不变的整体，因此他不可避免地离开了历史主义的原則，而提出了研究語言材料的

① 同前頁註，38 頁。

② 同前註，207 頁。

③ 同前註，45 頁。

靜態方法。索緒爾提出了這樣一條原理，認為在言語中所發生的一些各別的变化不會在本質上觸及語言体系的穩固狀態。所以在分析語言体系本身時，這些变化沒有任何意義。語言的狀況是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而自我变化的。索緒爾說：“言語活動只是以語言的某一狀況為基礎，發生于某種語言狀況之間的变化在言語中是沒有位置的。”^①

既然索緒爾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他得出結論說，語言不應當從歷史的觀點上去研究，或者照他的說法不能從“非同時”（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ий）的觀點去研究，而要从“同時”（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ий）的觀點去研究。所謂用“同時”的觀點去研究語言就是研究事物的現狀，確定語言的某一狀況。索緒爾認為只有同時性才能使我們有可能看清語言本身，而非同時性不能使我們來認識作為一個体系的語言，而只是一堆個人言語中的具有兩体系之間的性質的变化着的語言現象。索緒爾說：“語言中一切非同時現象都是通過言語發生的。在言語里可以找到一切变化的根源，每一個变化在尚未通用以前首先是在某些人中開始運用的。”^②

索緒爾認為語言學中有原則重要性和唯一決定意義的部分就是同時語言學，因為似乎正是它保證了把語言作為一個体系，作為一個穩固的封閉的語言狀況來研究。索緒爾說：“同時語言學研究的是联系各同時并存的要素并構成一個体系的邏輯和心理的关系，像同一個集體意識所感受的那樣來研究這些关系。”^③

語言是一個体系的主張以及語言体系穩固性的概念對於語言事實的研究發生過一定的良好影響，因為它使得語言學家有可能對許多語言作科學的描寫。社會學派隨鮑都恩·德·庫爾特內之後提出了研究語言的体系方法，這個方法考慮到了語言現象的相互作用，這一點也是好的。但是索緒爾和他的追隨者們不正確地把這一方法和歷史地研究語言對立起來。反歷史主義是社會學派的主要缺點之一。

儘管社會學派在語言科學的發展方面有一定的功勞，但是它的一般方法論的立場是錯誤的，在科學上是站不住的。這個學派在語言學

① 同前頁註，95 頁。

② 同前註，102 頁。

③ 同前註，106 頁。

中不正確地理解了語言的本質，不承認語言的物質性。社會學派把語言看成是約定的傳統體系，于是不承認語言只能够是有聲的。他們這樣說：“...語言是約定性的，并且約定符號的本性是無關緊要的。至于發音器官問題，自然在語言問題中是個次要問題。”^①

以索緒爾為首的心理社會學派是歐洲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它對於許多現代語言學學派，特別是目前的最流行的所謂結構主義學派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響。

在談到結構主義的理論以前，簡單談談另一個學派，它的產生是由于反對新語法學派的經驗主義以及新語法學派對某一質的產生和消亡的原因如不能用語音規律解釋就不願意去解釋的態度。這個學派的名称是功能主義學派。它大約是在本世紀 20 年代產生的。語言學中功能主義學派的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英語學家赫倫 (W. Horn)。他在他的“語言機體和語言功能”(Sprachkörper und Sprachfunktion) 那本篇幅不大但內容充實的書中主張：“功能支配着語言規律。”^② 這就是立刻採取了反對新語法學派的立場。

為這個學派所發展起來的語言要素的功能合理性理論向正確地了解語言本質前進了一大步。這個學派的代表者們在語言學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語言交際功能的決定作用。赫倫在上面提到的那本書中寫道：“語言是最大限度地为交際目的服務的，并且在它的發展中也可以看到它在力求更好地實現這個目的。所以它一定要拋棄那些沒用了的東西。”^③

把語言的發展理解為它的各個質的意思明確性的加強過程，而這種明確性是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所必需的。這樣的理解是功能主義的特點。

功能主義的學者們也要求語言的分析方法更加準確。一方面，他們認為要弄清語言某一功能的發展，弄清表達某一功能的語法形式就必需對語言事實作歷史比較研究。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應當在各個現

① 同前頁註，35 頁。

② W. 赫倫：Sprachkörper und Sprachfunktion, 2. Auflage, Leipzig, 1923, S. 131.

③ 同前註，2 頁。

象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語言，以便弄清一种功能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轉移。赫倫写到：“在这一方面比較研究作为弄清相互作用的一种方法是恰当的。”^①

功能主义的学者們表明了他們的分析具体語言材料的理論性的原理是有效果的。他們写了一系列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具有丰富的事实材料以及在对語言事实的历史比較和体系分析的基础上周密論証过的理論性的結論。对于功能語言学特別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些作品：柏哈哥尔（Бехагель）的“德語句法学”（«Неме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1923—1928）三卷集，卡尔·瑪也尔（Karl H. Mayer）的“保加利亞語变格的消失”（Der Untergang der Deklination im Bulgarischen）（1920）及其他。

至于功能学派的缺点，那應該說仍然是在解釋語法範疇上的心理主义，以及除了功能合理性以外有意地忽視对某一語法形式的形成有影响的其他因素。由于这个緣故，功能学派的学者們在他們的著作中非常注意說明各种形式消亡的原因，但很少說明代替語言中被排挤出去的形式的东西是怎样形成的。例如卡尔·瑪也尔正确地指出“只有当語言中有了完全等值的东西来代替每一格的功能以后，詞尾变格才成为多余的东西而不再通用了”^②。然而他并不打算确定，为什么用前置詞的体系去代替变格詞尾在保加利亞語中是完全等值的，而在其他斯拉夫語言中就不如此，在这些語言中尽管有各种前置詞，但仍然保留着变格的詞尾結構。这就限制了它提出复杂的問題，这也是整个功能学派的缺点。但尽管有这样的缺点，功能主义还是有助于更深刻理解語言的过程并用新的事实丰富了語言科学。

新語法学派的語音規律不可变更性这一主張也成了奥地利的語言学家胡格·舒哈尔特（Hugo Schuchardt）（1842—1928）在他們的著作中尖銳批評的对象。这位語言学家創始了外国語言学中的所謂文化历史学派。与新語法学派相反，舒哈尔特在語言的交融中看到了語音变化的原因。这种語言的融合或者是在人种上的融合範圍内进行的，或

① 同前頁②註，3頁。

② 瑪也尔：Der Untergang der Deklination im Bulgarischen, Heidelberg, 1920, s. 31.

者是在某些同族的、緊密相聯系着的社会集体之中进行的。他說：“在每一个大的中心，人口都有特別大的流动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融合。”^①

在现代外国語言学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各种派别的結構主义，結構語言学是索緒尔思想和鮑都恩·德·庫尔特內学說的繼續和發展。結構主义这一现代語言学中旗帜鮮明的派別，是 20 世紀 30 年代在布拉格的語言学家中形成起来的。因此被叫作語言学中的布拉格学派。1929 年布拉格語言学会發表了自己的綱領，提出了他們据以进行研究工作和分析語言材料的基本理論原理。这一对外国語言学有重大意义的綱領發表在布拉格学派的專門刊物《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布拉格語言学会著作彙刊”）第 1 期上。在这个刊物上發表作品的語言学家都把索緒尔看成是他們的精神之父。

布拉格語言学会是在 1926 年正式成立的。这个学会不仅仅發展了索緒尔的思想，而且还發展了鮑都恩·德·庫尔特內的許多思想，特别是他的音位理論。布拉格結構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特魯別茨柯伊（Н. С. Трубецкой）（1890—1938）在談到鮑都恩·德·庫尔特內的著作对結構音位学發展的意义时写道：“是鮑都恩·德·庫尔特內第一个想到应当有两种不同的关于音的描寫學問：一种是把具体的音作为物理現象来加以研究，一种是把具体的音作为語言集体用于交际目的的声音信号来加以研究”。^②

特魯別茨柯伊还指出，布拉格結構主义者在 1928 年海牙国际語言学大会上發表的簡要綱領中就已發展了鮑都恩的思想。在这个綱領中严格地把音位学和語音学划分开来。这种划分是以从語音中分出音位为基础的。布拉格結構主义者跟随着鮑都恩·德·庫尔特內把音位看作是对具有区分意义作用的語音典型的心理表象。此外，在这个綱領里还要求把語言看作一种体系，要求找出各种語言的音位体系的結構規律。

① 舒哈尔特：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Госиздлит，1950，35 頁。

②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v. 7, Praga, 1939, P. 8.

布拉格学派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细致地研究关于音位体系的学問上，他們把这門学問叫作音位学。根据布拉格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整个語言的語法构造和詞彙构造的性質是由音位体系和这一体系的特点决定的。因此，他們把音位学看作是語言学的基本学科而把它提到結構研究的首位上来。

上边已經說过，结构主义者在語音学和音位学之間划了一条界綫。特魯別茨柯伊把語音学規定为研究語音的物理、生理性質的科学，而音位学則主要研究每种具体語言的各个音的区分意义作用。他在論述这个問題的时候一开始就引用了索緒尔关于必需区分个人言語活动和語言結構的观点。特魯別茨柯伊說：“語言結構存在于該語言集体的全体成員的意識之中，并且是无数具体語言活动的基础。”^①

特魯別茨柯伊認為，應該相应地把語音和音位区分开来。語言是个人言語的因素；音位則是語言結構的因素，它沒有物理材料，只有功用。特魯別茨柯伊承認，他在早期著作中傾向于把音位看作是音的表象，这样的看法是同鮑都恩給音位所下的定义（音位是語音的心理等价物）相符合的，但他在晚期著作中在給音位下定义的問題上同鮑都恩·德·庫尔特內开始有了很大的分歧。特魯別茨柯伊在批評鮑都恩的定义时写道：“这个定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跟同一个音位相对应的可能有几个語音（作为它的变体），而每一个这样的語音都有自己的‘心理等价物’——即与之相适应的音响的和运动的表象。此外，这个定义还要有一个前提：語音本身应当是完全具体的現實的已知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②

特魯別茨柯伊認為語言的整个声音材料只存在于意識之中，它不是物理現實。他从这一主觀唯心主义前提出發而把音位看作是沒有物質性的因素。他說：

“音位首先是功用方面的概念。应当从功用方面来給它下定义。”^③

可見，在特魯別茨柯伊的理論中，音位不是被看作一种現實的声

① 同前頁②註，3頁。

② 同前註，37頁。

③ 同前註，3頁。

音現象，而是看作一種在任何物質之外的完全抽象的東西。這樣理解音位是唯心主義的，因為這樣解釋需要有一個前提，即思惟能夠脫離語言而存在。

按照結構主義者的意見，語音學只是關於個人言語的科學的一個部門，而音位學則是語言科學的一個重要部分。語音學研究音的物理方面，音位學是關於音的功用的科學。對語音學來說重要的是音的声响差別，即用耳朵或儀器所能感知的差別；對音位學來說重要的只是語義上或功用上的差別。這樣，在劃分音位和語音的基礎上也就劃分了音位學和語音學。而且，特魯別茨柯伊同其他結構主義者一樣，維護這樣一個觀點：一種語言的音位體系只能通過跟另一種語言音位體系的對立才能確定。按結構主義者的意見，只有弄清兩種語言的音位上的差別才能使我们認識所研究的語言內部各個音位間的差別。同時，結構主義者給“體系”“結構”這兩個術語的內容加進了特別的意義色彩，但他們運用這兩個術語並不是永遠前後一貫的。他們把結構看作是創造各種語法形式和詞彙形式的先驗可能性，而體系則是語言中的這些可能性的具體選擇。

在布拉格結構主義者的學說中，音位學是一門包羅萬象的語言科學。它首先從事分析和確定具體語言的音位體系，這是它的主要部門，叫作“體系音位學”(Фонология системы)。音位學的第二項任務是解決這樣一個問題：語言怎樣利用自己的音位體系來構成較大的語言單位，即詞、詞素和句子。根據所研究的語言單位的性質，又建立了音位學的如下一些部門：詞的音位學(Фонология слова)，詞素音位學(морфофонология)和組合音位學(фонология синтагмы)。這些部門從語言的音位數量，或如特魯別茨柯伊所說的從所研究的語言的音位清單出發，確定組織音位來創造語言綜合體的各种可能性。按照他的意見，音位的數目決定詞彙的豐富程度、語言語法構造的性質、語調手段的選擇等等。

這樣誇大語言音位構造的作用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因為語言不是自我產生的，它是社會為了滿足對交際手段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人民根據概念數量增長的需要，並根據遠古時代就已奠定了的語言發展的一定趨勢，為自己創造了語言手段，其中包括音位。如果有時需要

問語言中哪一個組成部分決定其他組成部分的性質，那麼這樣的組成部分也未必是語言的音位構造。語法因素和詞彙因素的性質類型在一定程度上却能夠決定語言音位構造的變體和數量，例如，漢藏語系的某些語言，由於詞的結構是單音節型的（這又是由於這些語言語法構造的孤立性質所造成的），所以它們的音位構造在數量上特別豐富。如，根據特魯別茨柯伊的材料，緬甸語有112個音位^①，這使得緬甸語儘管它的詞的結構有極嚴格的條件（而永遠是單音節的，結尾必須有元音），但仍有足夠數量的詞以表示在現代發展水平上人類思維所形成並在人民生活中所運用的全部概念。印歐語語言的屈折性質的構造決定了詞的多音節結構，因而就沒有必要發展過多的音位。因此，任何一種印歐語言的音位清單中都不超過30—40個音位。

應當注意到，某種語言中詞的數量不是由該語言音位的數量決定的，為了保證每個人民都有一切可能在現代需要範圍內增加概念的數量，就需要有一定數量的概念的物質外殼，這種需要決定了詞的數量。

結構主義者誇大音位清單在語言體系中的作用，還表現為他們採取反歷史主義態度研究語言事實。語言的音位構造是一個歷史上的變數：它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變化着，根據語言發展的具体條件或是縮小或是擴大。例如，從俄語的發展中可以看到音位構造比古俄語時大大縮小的現象，只是由於清元音的消失或轉成 *o* 和 *e* (*мѣхъ*——*мохъ*, *дѣнь*——*день*) 就失去了兩個音位。

布拉格結構主義者的理論原理雖然有上述這些缺點，但他們的著作整個來說還是很有用和有成效的。因為他們在理論上研究並描寫了大量語言，這些語言在這以前是科學界很少知道的。突出的如特魯別茨柯伊一個人就描寫了200種以上的語言，並且使科學界熟悉了這些語言。布拉格結構主義者在制定分析語言材料和科學地描寫語言材料的方法方面也作了許多工作。

現代外國最重要的關於語言接近性的起源的理論之一——語言聯盟論也是與特魯別茨柯伊的名字聯繫着的。尚在20年代特魯別茨柯伊從事分析和從理論上研究高加索諸語言時就已得出這樣一種想法：地域相鄰的諸語言中許多構形因素的相近甚至聲音相同，可能是由於他

①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v. 7. p. 220.

們的相互影响产生的。高加索諸語言的材料使得特魯別茨柯伊确信：施萊哈尔的母語假說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福尔圖拿托夫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意識到了，福尔圖拿托夫学派对于特魯別茨柯伊成为一个語言學家起了很大作用。特魯別茨柯伊开始一貫維護約翰·史密斯的波浪論，他認為这个理論不仅适用于一个語言的各种方言，而且适用于非同族的但散布地域邻接的諸語言。

特魯別茨柯伊認為語言的相互接触具有很大意义，这一思想他几乎保持了20年。在篇幅不大但內容深刻有趣的文章“关于印欧人問題的一些想法”（Мысли о проблем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ев）中完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篇文章是他死后在1939年發表的。在这篇著作中特魯別茨柯伊提出了他的著名論点：“語系”这一概念并不一定要求这一組語言起源于一个母語。在專門談到印欧諸語言的起源問題时，特魯別茨柯伊写道：“老实說，認為有过統一的印欧語，而各支印欧語都来自这个統一的印欧語这种假說是没有什么特別根据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認為，各支印欧語的祖先是彼此近似的，通过不断接触、相互影响和相互假借而使彼此逐漸更加接近了，但在任何时期也沒有成为完全一致的。”^①

特魯別茨柯伊特別善于深入整個現象的本質和細致地系統地整理各种事实。他以这种特有的能力提出了印欧系諸語言的6个結構特征，即：

1. 沒有元音的和協。
2. 詞首的輔音構造不比詞中和詞末的貧乏。
3. 詞不一定從詞根開始，它可以有前綴。
4. 不僅借助于詞綴構形，而且還通過詞根中的元音交替來構形。
5. 除元音交替外還有輔音的自由交替也起詞法作用。
6. 及物動詞的主語和不及物動詞的主語形式相同。

这6个結構特征中每一个都能在非印欧語言中遇到，但只有屬於印欧系的各種語言才同时具有这6个特征。因此，按特魯別茨柯伊的

① 特魯別茨柯伊：Gedanken über das Indogermanenproblem. “Acta linguistica”. Copenhagen, 1939, 82 頁。

意見，一種語言若沒有這6個特征，即使在它的詞彙里有許多同印歐諸語言相對應的因素，也不能算是印歐語。相反，一種語言即使大部分形式因素和詞彙是從非印歐語借入的，只要具備了上述6個結構特征，則仍然算作印歐語。

特魯別茨柯伊確定了印歐系諸語言必備的結構特征之後，進而認為：一種語言，如果失去了這6個結構特征中的一個，就不再是印歐語了；相反，一種語言，如果獲得了上述6個特征中它所缺少的特征，就成了印歐語。在某種語言里第一次齊備這6個結構特征（該語言詞彙中又有一定數量的詞同以後在書面文獻中得到印証的印歐諸語言有規則的對應）的時間就是語言的印歐體系產生的時刻。但這並不排斥如下的可能性，即：在此同時有幾種語言由於地域鄰接的結果都成了印歐語。

特魯別茨柯伊對高加索諸語言、芬蘭—烏格爾諸語言以及其他非印歐語言有卓越的知識並且熟練地掌握了歷史比較法，他在这个基礎上企圖弄清最初散布印歐語的地區。他認為，產生語言的「歐」構造的地區應當跟具有上述6個結構特征中某一部分特征的語系的地域相鄰接。按照他的看法，在印歐語系的形成中有兩大羣語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是：1. 烏拉爾—阿爾泰語羣，它有與印歐語相同的主格結構（第6個結構特征）和輔音的自由交替（第5個特征）（但這種交替只存在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羣的芬蘭—烏格爾部分中）；2. 地中海地區的語羣，現在的高加索諸語言和閃密特諸語言可以代表這一語羣的古代構造，在印歐語所具有的上述6個結構特征中它有前4個。

特魯別茨柯伊企圖通過對各種音位要素和詞法要素的分析來證明，印歐語是從與現代東高加索諸語言的類型相似的类型向與芬蘭—烏格爾諸語言和阿爾泰諸語言構造相似的类型發展的。

印歐語的這6個結構特征確實可以代表印歐語系的特点。但是不能同意特魯別茨柯伊這樣的意見：失去6個特征中的一個或獲得一兩個所缺少的結構特征，就能決定一種語言不再是或已成為印歐語。

分析了現代的印度伊朗諸語言之後發現其中有所謂主動結構（эргативн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這種結構在梵語和普拉克利特語

(праkrit) 各方言中都沒有。^① 这样，印欧語系的一个語支由于消失了第 6 个特征而破坏了 6 个結構特征的系统，但是現在印度諸語言完全有根据地仍然被看作是印欧語言。元音和协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在印欧諸語言中确实沒有順行的元音和协即所有元音向前置的詞根音节的元音看齐，但在日尔曼諸語言中却可以找到逆行的元音和协的因素即后边的元音影响前边的元音（u 音变現象）。这个現象并不妨碍日尔曼語具有一般的印欧語性質。

看来，問題不在这些任意选出来的結構特征，而在于物質对应，首先是构詞手段和詞形变化手段体系中的对应以及古代的根詞素的对应上。

特魯別茨柯伊把印欧諸語言的形成过程看作由远古时若干組人民历史上的和地域上的相互联系所决定的历史过程，这无疑是特魯別茨柯伊观点中可以肯定的东西。

語言联盟的思想对研究某些組語言，如高加索諸語言、汉藏諸語言和許多其他語言是很有成效的。研究巴尔干各人民的語言接触的后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巴尔干各人民的語言有新的結構上的和物質上的共同性，虽然这些語言是属于印欧語系的不同語支的，而巴尔干語言中的土耳其語还完全不是印欧語。

用語言联盟論来研究苏联各人民的語言也是有很大远景的，因为这些民族的經常合作使得他們的語言中产生了共同的要素。

布拉格結構主义學派在許多国家里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在布拉格語言学会的直接影响下在丹麦产生了一个語言学团体。这个团体起初完全支持布拉格學派的各項理論原則，但不久在丹麦語言学家的著作中就开始出現了自己的特点，丹麦的結構主义获得了独特的性質，因而可以把它看作語言学中的一个特別學派。

丹麦結構主义學派或称哥本哈根學派，它的首領过去是布龙达尔 (В. Брендалъ) (1887—1942)，現在是耶尔姆斯列夫 (Л. Ельмслев) (1899)。1939 年發表了布龙达尔的語言学工作綱領。布龙达尔死后，在 1943 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普通語言学概要” (Очерк

^① 見 Jules Bloch *L'Indo-aryen du Veda aux temps modernes*, Paris, 1934.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在这两部著作中叙述了哥本哈根结构主义的各項基本原則。

在这两部和某些其他著作里布龙达尔就已經完全放棄了用以解釋語言學問題的心理主义而采取了德國哲學家胡塞爾 (Гуссерль)——所謂“形式哲學”(«Гештальтфилософия») 的創始人——的邏輯斯提體系。根據胡塞爾的理論，邏輯是純先驗的科學，既不从屬於心理學也不从屬於社會，只与超時間的絕對真理有關係。它作為一門科學应当從事描寫這些真理或現象的本質，這些現象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理的現實，似乎只是不依賴于任何東西的永存的思想、永世的价值。布龙达尔和他的信徒依據胡塞爾的唯心主义理論而更加強調非歷史地研究作為語言不動狀態各個部分的語言事實的合理性。結構主义者認為，語法範疇是包羅萬象的不變思維的表現，因而他們從自己的語言學活動的綱領中完全取消了歷史方法，一切都建立在語言體系內部各語言事實的對立上（他們常用 оппозиция 來表示“對立”）。索緒爾提出了語言結構的靜態描寫的原則，而結構主义者則要實現語言的細致的結構描寫研究——研究作為結構單位的語言，同時確定了所謂“先驗的語法”(априор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或“概念的語法”(понятий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的基本原理。与布拉格學派相反，哥本哈根學派把全部努力放在研究先驗的包羅萬象的語法上，把這種語法作為任何語言結構的基礎。

結構主义者的普遍語法定出各種邏輯的或概念的範疇，認為這些範疇是一切時代和一切人民的語言都必須具備的，因為包羅萬象的“集體意識”包含在永遠存在的理性原則的總合中，而這些原則是建立每個具體語言體系的基础。根據這個理論前提，普遍語法應當定出最低量和最高量的可能有的詞類，找出可能有的格的关系，句子的邏輯分析必備的形式等等。先驗的普遍語法的目的是確定永存的和不變的邏輯範疇，而在分析具體語言的語法結構時就根據這些範疇來劃分詞和形式。普遍語法所確定的語言的“超時間”範疇既不依賴于語言的具體物質也不依賴于語言集體的思維過程，它們是一般思維與具體有聲語言間的獨立中介。哥本哈根結構主义者認為，每種語言的結構都正是建立在這些邏輯範疇的基礎之上的，而且還是根據兩個超時間，

超語言和超地域的規律來建立的，這兩個規律就是確定者同被確定者發生關係的規律（根據它來構成某一個組合）和聯想的規律。這樣，任何語法關係都被結構主義者看作是確定者對被確定者的關係，例如，在主要句和從屬句的關係中被確定者是主要句，確定者是從屬句。主語對謂語的關係同樣也是確定者對被確定者的關係，其中主語被看作是被確定者，等等。至於聯想的規律，則是指使得有可能在意識中把詞和個別的事物或事物之間的關係聯繫起來的東西，例如，如果您運用 книга（書）這個詞，那末在您腦子裡就會產生同某一本書具體的書，它的各個部分、它的位置等等的聯想聯繫。

結構主義者還認為這兩個決定語言體系平衡的規律本身又是建立在絕對的、超時間的對立規律之上的。按結構主義者的看法，每個體系都是建立在自己各單位的對立之上的。譬如，небо（天）這個詞，如果它不和 земля（地）這個詞相對立，就不可能存在；женщина（女人）這個詞，如不和 мужчина（男人）這個詞對立，就不能存在；濁輔音 б, д, г，如它們不和清輔音 п, т, к 對立，就不能存在，等等。

結構主義者研究出來的所有這些規律本來都可以看作語言中的個別的、局部的、有條件的規律，作為對具體的語言材料的某些觀察的結果接受下來，但問題在於，結構主義者把它抬高成為某種不變的、絕對的、不依賴於具體語言材料的、永世長存的和不依賴於社會需要的東西。只要看一看這樣一個論點就夠了，他們認為語言中的一切都存在於對立之中，對立之外沒有語言。這個論點是結構主義的兩個學派共有的，難道具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人能夠認為，這個或那個詞之所以存在，僅僅因為它跟另外的詞對立嗎。要知道，詞不是結構內部特點造成的，它是因為社會有給新創造的或新認識到的事物或現象命名的需要而創造的，現實的實際是語言一切單位的源泉，這些單位是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並且概括地反映著現實；由結構內部條件決定的僅僅是它們的形式因素而不是內容。

哥本哈根結構主義認為，思維和所有邏輯範疇都是不動的、永存的，並且不依賴於具體語言物質。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思維只是人類社會的成員才具有的，因此它與人類社會的發展一起產生和發展。

同时，思维以及它的各种逻辑范畴是不能存在于具体语言物质之外的。思维永远是和语言联系着的，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而且语言的语法构造是语言 and 思想的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每一种语言都制定自己独特的语法规则，自己独特的组词成句的规则，这些规则与其他语言的规则可能有原则区别，因为每个人民在语言创造上都是独立的。每个人民按自己的方式来认识现实中的现象和事物的现实相互关系并且按自己的方式在自己语言的语法构造里把它们加以抽象。事物和现象间的相互关系本身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人们对它的认识而存在着的。譬如说，现实中的现象在时间里发展着。这种发展不依赖于人们是否认识了发展的时间关系。行为者对所进行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关系、空间上的关系等等，但对这个关系认识的完整程度有多有少，这就使得不同语言中的语法范畴具有不同的外延。因此，语法范畴在内容上的一定共同性不是由思维和它的各范畴的永存性、不动性造成的，而是由人们对现实中事物和现象间客观存在的关系认识的正确性造成的，思维本身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中慢慢地、逐渐地发展着并创制着自己的逻辑抽象。

在结束我们对哥本哈根结构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的分析时，必须谈一谈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观点，因为他的观点中有某些独特的地方并且对许多现代语言学家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耶尔姆斯列夫把自己的语言理论体系叫作言符学（глоссема-тика）。耶尔姆斯列夫在自己的言符学范围内发展了作为语言符号的言（гlossa）的学说，这个符号有两个组成因素：表现和内容。这两个组成因素中每一个又都有形式和实体。符号的形式是由它的表现的音位形式和它的内容的语义形式构成的。同时，耶尔姆斯列夫强调指出，符号的形式不依赖于自己的声音实体，并且应当脱离声音实体来研究它，这就是说，两种不同的语言可能有相同的言（гlossa）的表现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音位构造可能完全一致，而不同语言的词的物理内容、它们的具体语音构造可能是不同的。尽管“物理实体”不同，这些不同语言的词却可以看作一个言。相反，同一个词的不同格的形式，虽然它们的语音实体相同，但按耶尔姆斯列夫的意见，却是不同的言。例如，俄语词第一格 ветер（风）是一个言，而第四格 ветер 则

是另外一个言。

这样，耶尔姆斯列夫把结构主义的一般趋向发展到了极端，即完全排除了语言物质。似乎在研究语言的结构时语言物质是不重要的、非本质的因素。结构主义者耶尔姆斯列夫把语言看作是有声言语的具体物质之外的任意选择的符号总合。在这方面耶尔姆斯列夫明显地与美国语言学的一个流派——所谓“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相接近。他与美国语义学派相近的地方还在于他们都热衷于令人头痛的杜撰的术语和数学式的公式。

应当指出，同语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语义语言学是最反动、最没有成效的语言学说。这个学说把语言看作生物现象，看作生物机体对外界刺激所发出的信号。“语言”这个术语并不一定是指有声语言。语义学派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体系的论点，但又与索绪尔不同，对语言符号作了庸俗唯物论的解释。他们说，词是一种符号与供给食物时发出的铃声对狗是一种符号，两者是一样的，词引起人的同样的条件反射。既然语言符号能引起条件反射，在语义学派看来，语言学就可以解决社会政治任务，即促使阶级斗争熄灭、巩固和保存现行的社会制度。实现这项任务的方法是做到在重复一定的词时能引起人们有益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反射。此外，美国语义派语言学宣称词的意义具有个人相对性的理论，制定了所谓上下文学说。根据这个理论，全部词分成两组：1) 有物理上下文的词；2) 没有物理上下文而只有象征（语词）上下文的词。每个词的象征上下文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语义学派用物理上下文这个术语表示词跟物理物体的联系。具有这一联系的是 стол（桌子），книга（书），город（城市）等等一类词。在语义学派看来，如 свобода（自由），равенство（平等），демократия（民主）等等一类词则没有这种联系，它们是一些杜撰、臆造。每个人似乎都给这些词以自己的意义，跟其他人给这些词的意义是不同的。因此宣传家能够为了一定政治目的而影响这些个人的意义。

例如，美国语言学家握尔波尔（Уолпол）在“语义学、词和词义的本性”（«Семантика, природа слов и их значений»）一书中开出了跟 материализм（唯物主义），идеализм（唯心主

义)等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作斗争的方案,指出用怎样的蛊惑人心的把戏能够降低前一个词的意义而抬高后一个词的意义。

美国语义派语言学之所以需要物理上下文这个概念是为了论证进步的概念的臆造性。美国各种语义学参考书有整整一章来阐述这个问题,这一章叫作“杜撰”或“臆造”,掘尔波尔说道:“臆造就是用以造成我们幻想的东西。正义同它的同伴:友谊、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孤立主义、绥靖主义——一起都是臆造。”^①“现实本身是一个大臆造”。^②

值得注意的是,如“殖民统治”这样的意义,掘尔波尔则不认为是臆造,而认为它是符合物理上下文的。

英美语义学派的一切鬼手法(有时甚至是相当巧妙的)都是远离真正科学的无用把戏,因为词的意义不是个人任意创造的结果,而是由社会在认识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过程中确定的,有人企图排除这些或那些词,使它们不再被运用,宣布它们是无意义的抽象,但所有这些企图都不能使实在现实中事物的相互关系产生任何改变,而且一个词也不是能根据某个语言学家的妄想而被排除的,因为作为认识现实的结果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是不能存在于声音的即物质的外壳之外的。

× × ×

我们再回来看一看历史比较语言学。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现了已死的赫特-鲁维语支的语言和两种吐火罗方言,在这一发现提供的新印欧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在20世纪第二个25年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得到了极为繁荣的发展。各种学派和各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团结起他们的力量来重新审查他们的先行者即新语法学者所提出的印欧语言学一切最重要问题。有关印欧语系人民的最初居住地区和统一印欧语分解成印欧系各独立语言的大概时间等问题的旧解决方案首先受到了重新审查。以前认为亚洲是印欧人民的“原始故乡”,后来德国的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有根据地推翻了这个假说,并且提出了新的假说,认为印欧人的最初居住地区是欧洲的北方,主

① 掘尔波尔: Semantics. The Nature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New York, 1941, 159 页。

② 同前註 168 页。

要是北德意志地区，但是德国印欧学家的观点在现代语言学中没有得到支持。新得到的和仔细分析过的语言事实和古代类型的地名材料为反对认为操印欧系语言的民族起源于北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论据。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是保加利亚学者伏拉基密尔·格奥尔基耶夫(Владимир Георгиев)，他是欧洲最大的语言学家之一。格奥尔基耶夫在他的重要研究著作“先希腊语言学”(«Догре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索非亚，第1卷—1941年出版，第2卷—1945年出版)中通过对希腊文字文献的语言中先希腊因素以及南俄罗斯和地中海、爱琴海地区的先希腊性质的地名的分析雄辩地证明了先希腊居民按其语言的性质是属于印欧系的。格奥尔基耶夫依据可靠的事实材料就古代印欧语系人民的散布问题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早在纪元前五千年或者甚至更早，中欧和东欧(但不是东北欧)——大致是德意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俄罗斯欧洲部分、巴尔干半岛(包括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极限还可能包括北意大利——就已居住着印欧人…那时印欧语就已经有方言差别，虽然方言间的差别还不很大。

这里主要有三组方言：北部印欧方言、中部印欧方言、南部印欧方言。操北部印欧方言的有日尔曼人、波罗的斯拉夫人，操中部印欧方言的有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印度伊朗人。喀尔特人(Кельты)是联系日尔曼人和意大利人的环节。操南部印欧方言的人有皮拉兹格人(пелазги)、鲁维人(лувийцы)、赫特人(хетты)和使用象形文字的赫特人(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е хетты)；弗拉科人(фракийцы)和依利里人(иллирийцы)看来可能是联系这几组人的环节。吐火罗人(тохарцы)大概是住在邻近弗拉科人的某个地方。很可能，原始希腊部落大约在纪元前12世纪才来到爱琴海地区，他们逐渐占据了先希腊居民的领土。他们还推动了所谓爱琴迁徙，参加这一迁徙的有各种不同的部落。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发生过反复的、多次的语言混合。就这样通过各种印欧语方言的分层和交融而产生了利地语(лидийский язык)、利科语(ликнийский язык)和卡里语(карийский язык)，但皮拉兹格语或鲁维语是它们的基础。

上述三组方言中，直到不久以前我们了解得最好的是中部印欧方

言(拉丁、希腊、印度)。其次是北部印欧語(喀尔特、日尔曼、波罗的斯拉夫)因为这些語言只有時間較晚的語言文献。直到現在印欧諸語言比較語法主要建立在中部印欧諸方言的基础上,在較少程度上建立在北部印欧諸語言的基础上。”^①

格奧爾基耶夫在“印欧諸語言产生的問題”(«Проблемы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一文中仍然維護这个观点,这篇文章發表在“語言学問題”杂志1956年第1期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些补充的語言材料,这些材料推翻了关于印欧諸語言的旧論点,旧論点認為各个印欧語言从共同基础分立出来是發生在紀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間甚至末期的事。格奧爾基耶夫令人信服地証明了印欧諸語言的分化是紀元前三千年以前發生的。

上述观点得到苏联最大考古学家之一特列奇雅科夫(П. Н. Третьяков)的支持。特列奇雅科夫在他的著作“东斯拉夫諸部落”(«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племена»)的第2版(1953年版)中在印欧諸部落出現的時間問題上还是贊成傳統观点的,而在“历史問題”杂志1953年第11期上就把这一时期移到更早的时期,即紀元前第四个千年,認為巴尔干—多瑙地区的居民那时基本上就已經是印欧人了。

不久前完成了对紀元前17—12世紀的密里特—新干文字文献的解讀工作。这些文献为我们揭示出了一种特殊的希腊方言。这一解讀工作有力地証明了关于印欧諸語言起源的新理論的正确性。解讀这些文献的功劳也是属于格奧爾基耶夫的。应当指出,20世紀斯拉夫国家的語言学家在解讀死語言的文字方面佔第一位。例如,現代历史比較語言学之能够深入了解赫特語文字文献的内容和正确地决定赫特語語法构造的印欧語性質都要归功于捷克最大的語言学家格罗茲內(Б. Грозный)。正是由于这位学者的卓越研究工作才使得印欧語言学有可能进一步發展起来,并且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印欧諸語言的比較語法。

苏联語言学在解讀难解的文字(虽然不是印欧語的)方面有很大成就。青年学者科諾洛佐夫(Ю. В. Кнорозов)找到了一把鑰

① 格奧爾基 Vorgriech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Sofia, 1941, 155頁。

起来了解用以書寫美洲古代有高度天賦的文明的人民——馬雅人(майя)的文献的約定的象形文字体系。在这以前只是解讀了馬雅人的曆法文献。这些曆法文献是建立在高度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識之上的。犹利·科諾洛佐夫天才工作的結果使科学現在能够了解馬雅人文化發展的某些其他方面。科諾洛佐夫的研究成果在1955年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用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題为“古代馬雅人的文字体系(解讀初試)”(«Система письма древних майя. (Опыт расши-
ровки»).

历史比較語言學的第四代代表人物的極大成就是他們研究出了所謂“喉音理論”(ларинг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推动这一理論發展的有两个因素：1) 1879年出現了索緒爾的重要著作“印歐語元音原始体系的研究”，2) 在赫特語中發現了 h 这个特別的音。

索緒爾分析当时所知的印歐語語音构造的材料而作出了一个假設：印歐基础語言还应当有两个特別的濁性質的音。在历史上得到印証的印歐諸語言中沒有保存这两个音，但在每个古印歐語言中都留下了存在过这两个音的痕跡。索緒爾用大写字母 A 和 O 表示这两个假設的音。它們的連音影响，按索緒爾的意見，是产生長的 a, ё ö 和出現印歐諸語言語音构造某些其他特点的原因。

索緒爾的这个意見在很長時間內仍然只是一个獨創性的但未得到語言事實証明的假說，一直到科学界知道了赫特語的材料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对赫特語材料进行历史比較分析的結果表明：赫特語的許多形式和詞中，正好在索緒爾設想应当有他假設的两个音中之一即他用符号 A 表示的音的位置上，有一个表示特別音的文字符号。这样，索緒爾假說的正確性就为实际語言材料所証實了。

在現代的“喉音理論”的發展上，波兰的語言学家庫里洛維奇(Ю. Курилович)和法国的語言学家本溫尼斯特(Э. Бенвенист)的研究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庫里洛維奇在他的“印歐語研究”(«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этюды»)^①这部对印歐語言學極為重要的著作中發展了認為所謂印歐基础語言有过三个喉音的理論并且确定了

① 見庫里洛維奇的 Etudes indoeuropéennes, Krakow, 1935.

它們的輔音性質。庫里洛維奇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喉音對最古時期的印歐諸語言的語音構造發生了怎样的位置影響，他因而得出了對印歐語詞根性質的新理解：他把詞根規定為純語音的範疇，但不能無保留地同意這種理解，詞根是句中基本意義的持有者，因此研究時是不能不考慮到它們的意義的。但這一保留不能否定庫里洛維奇基本論點的正確性，這個基本論點就是：印歐語詞根起初只能以輔音開頭，而那些記錄在書面文獻中以元音開頭的詞根中，在某一個時期在這一元音之前曾有过喉音，例如，拉丁詞 *ante* (在...前) 和赫特詞 *hanti*。

本溫尼斯特依據喉音理論企圖揭示印歐語構詞過程，他把這一過程，也是看作純語音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詞根的語義方面似乎不起任何作用。本溫尼斯特在他於 1935 年用法文發表的“印歐語體詞構詞法”(«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имен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中企圖證明語音因素對印歐語體詞詞身的詞法結構起決定性的影響。本溫尼斯特根據自己分析的結果制定了印歐語詞根的五點理論：

“1. 印歐語詞根是單音節的、三字母的，它由位於兩個不同輔音之間的基本 *e* 構成。

2. 在永遠不變的公式：輔音 + *e* + 輔音中兩個輔音可以採取任何次序，只要它們是不相同的就可以，只有清音不能跟送氣濁音配合。

3. 由詞根加後綴構成兩個交替的詞身：I 是帶完全元音的重讀詞根 + 零級的后綴；II 是零級詞根 + 帶完全元音的重讀后綴。

4. 給後綴只能加上一個擴展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或者加在附於詞身 I 的后綴之後，或者加在詞身 II 中詞根和后綴之間 (加中綴法)。

5. 如果給已有後綴和擴展的詞身再加一個擴展或後綴，結果就一定是體詞詞身”。①

喉音理論有它的追隨者和繼承者，但同時也有反對者。它的反對者，例如，班凡特 (Дж. Бонфанте) 和波科爾內 (Покорный)。班凡特是現今在意大利佔統治地位的學派“唯心主義新語言學”(«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не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這個學派的自稱) 的

① 本溫尼斯特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имен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Госиздат, 1955, 201—202 頁。

著名代表人物，波科尔内是德国 1927—1932 年出版三卷集重要著作“印欧諸語言比較詞典”（«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①的作者之一。談到想進一步研討喉音理論的人，則應當提一提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Э. Сепир）和斯台爾特萬特（Э. Стертевант）的觀點，他們認為喉音不是 3 個而是 4 個。

在這方面我們還想提出對列曼（В. П. Леманн）的某些反駁意見。列曼在“原始印歐語音位學”（«Прото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фонология»）（1952 年出版於美國）中企圖證明，喉音只存在於原始印歐語中，而在印歐語和以後由它分出來的各印歐語中只有喉音的反映。

這個觀點實質上是以施萊哈爾的把印歐母語看作實際存在過的統一語言的觀念為基礎的。新語法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駁倒了這個幼稚的觀點。新語法學派研究出了對基礎語言的更合理的觀點，即把基礎語言看作因語法構造、根詞彙和構詞因素極為相近而聯合起來並且互相影響和互相作用的一些方言的總合。這種觀點大大促進了對個別組印歐語的許多獨具特點的解釋，特別是當考慮到底層（субстрат）的影響時。能夠受底層影響的，不是久已不存在的音的反映，而是實在的音。赫特語的事實完全証實了喉音的實際存在。至於由楔形文字符號來表達的作為音素 h 的赫特語音是否真是喉音之一的本來語音形式，則是不關緊要的。赫特語中的底層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它能大大改變喉音的性質。重要的是，如果這個底層即使改變了這個音，但仍然是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音保留下來了。

喉音是一切印歐語言的共同財富，而且是極為特殊的財富。其他語系的語言可能沒有類似的音，例外大概只有高加索型的語言。如果從易于消失這點來判斷，喉音是處於大大減弱的狀態中。如果某一個個別的印歐語言，譬如說，同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語言發生了底層接觸（субстратный контакт），那末這就能促使喉音逐漸完全消失，在語言方面被戰勝了的非印歐居民掌握了印歐言語，而給予這一言語

① 這部詞典的作者有兩個人——瓦爾德（Вальде）和波科尔内。

以部分的新發音色彩，對他們的發音習慣格格不入並且憑听觉難以捉摸的喉音，他們感到了有这样的音，但实际發音時並不發出这个音而只是改變喉音周圍的音的發音特点，這種方法是以言語存在的前文字時期的快速口語的特点為基礎的。假定語言材料已經在書面上固定下來了，那麼結果就可能是另外的樣子了。要讀已寫出的符號就不得不為它找出某個獨立的發音表現。印歐語語音構造新產生的發音特点又會漸漸地傳給本來就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

如果個別的印象語言同有近似喉音的音的語言發生了底層接觸，那麼印歐語的喉音就會作為獨立的音保存下來，但會跟被戰勝的非印歐語類似的音同化起來。看來，赫特語的情況就是這樣的。許多語言學家都認為它有高加索語的底層是顯而易見的。

現代歷史比較語言學家，除了研究印歐語言學的局部性問題之外，還著述了許多關於個別印歐語的大部頭著作，這些著作大大豐富了語言科學這一主要部門。在這方面首先應當指出丹麥語言學家彼得爾遜（Х. Педерсен）的許多著作。他写出了這樣一些有趣的書，如“赫特語和其他諸印歐語”（«Хеттский и други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языки»）（哥本哈根，1938 年版），“從比較印歐諸語言的觀點看吐火羅語”（«Тохарский язык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равнения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哥本哈根，1941 年版）。同呂意斯（Г. Льюис）合著的“喀爾特諸語言簡明比較語法”（«Кратка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ельтских языков»）（該亭根（Геттинген）1937 年版和莫斯科 1954 年版）以及其他等等。這些著作的特點在於，它們不是純描寫性質的，例如，與德國語言學家弗里特里希（И. Фридрих）的類似著作不同。彼得爾遜的著作中利用了大量的歷史比較材料並且對這些材料作了極有趣的理論解釋。彼得爾遜企圖為他所分析的語言的每一個個別因素找出理論上的解釋，而且這些解釋多數都是很有獨到之處並且經過可靠論證的。儘管有些還有待商榷。

1952 年在索非亞出版了保加利亞著名學者傑切夫（Л. Дечев）的篇幅不大的書籍“弗拉科語特點描述”（«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фрак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保加利亞語叫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на

тракийския език»), 这是历史比較語言学界的一件大事。弗拉科語是巴尔干半島的一种已死的印欧語, 它有極大的科学价值, 因为它很明显同阿尔巴尼亞語有發生学上的联系, 阿尔巴尼亞語在印欧語系中处于一种孤立的地位。

傑切夫只分析弗拉科語詞的語音构造, 因为沒有弗拉科語的連貫文章无法研究这种語言的詞法和句法。尽管材料有限, 傑切夫仍然雄辯地証明了, 弗拉科語与跟它在地域上接近的同时代的两种語言依利里語 (илирийский язык) 和弗里格語 (фригийский язык) 不同, 前者是屬於 «сатем» 組的, 而后二者, 按傑切夫的意見, 則是屬 «кентум» 組的。証明阿尔巴尼亞語是弗拉科語的直接繼續的証据也是很有趣的。但是, 傑切夫認為弗拉科語起初跟伊朗諸語言有密切的亲屬关系, 而它的不同于伊朗諸語言的特点是由于它跟埃特魯斯語 (этрусский язык) 融合而产生的。他的这个观点是沒有說服力的。为了証明这点必須引用更多的材料, 引用弗拉科語和埃特魯斯語詞法材料, 构詞材料, 而我們現在对埃特魯斯語的了解程度以及弗拉科語的連貫書面文献的缺如都是我們現在还不能作到这些。

苏联語言学家对历史比較語言学, 主要是在研究伊朗諸語言方面, 有很大貢獻。1949 年出版了阿巴耶夫 (В. И. Абаев) 的材料丰富, 理論总结深刻的著作 “奥森庭語言和民間創作” («Осетинский язык и фольклор»). 这本书的基本論点是这样一个思想: 奥森庭語是在高加索語底層上的伊朗語。虽然沒有 19 世紀以前时期的奥森語書面文献, 但阿巴耶夫借助于历史比較分析和对奥森庭民間創作材料的分析相当明确地描繪出了奥森庭語在将近两千年过程中的發展情况。在这本書中还証明了把奥森庭人跟古阿兰人 (аланы) 看作是同一个人民是正确的。阿兰人在紀元前 7 世紀到紀元前 3 世紀的时期是屬於斯基弗—薩尔馬特部落組合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ие племенны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的。

在苏联的領土上居住着許多操伊朗諸語言的人民。这些伊朗語言几乎直到現在还是很少被描写过的, 从而也是历史比較語言学所很少能够利用的。因此, 索科洛娃 (В. С. Соколова) 論述苏联領土上的伊朗諸語言語音的各种著作的問世填补了这方面的重大空白。在这

位天才語言學家的許多著作中特別應當提出“塔吉克語語音學”(«Фонетика таджикского языка») (1949年出版)和“伊朗諸語言語音學大綱”(«Очерки по фонетике 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1953年出版)。後書的第1卷是分析別魯日語(белужский язык)、庫爾德語(курдский язык)、塔雷什語(талышский язык)、塔特語(татский язык)的語音構造的,第2卷分析了奧森庭語、雅格諾布語(ягнобский язык)和帕米爾諸語言(памирские языки)。

索科洛娃的著作是根據描寫語音學的方案編寫的,但是每一種到現在還很少研究過的伊朗語的語音體系的科學描寫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進一步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還有密勒(Б. В. Миллер)的著作“塔雷什語言”(«Талыжский язык») (1953年出版)和拉斯托爾古耶娃(В. С. Расторгуева)的兩卷集著作“塔吉克語方言學大綱”(«Очерки по таджикской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1952年出版)。“塔雷什語言”不僅描寫了這種少文字的伊朗語言的語音構造,而且描寫了它的語法構造。“塔吉克語方言學大綱”描寫了塔吉克語的瓦爾佐布土語(варзобский говор)的語音和語法(第1卷)和色丹(Шайдан) — 阿什特(Ашт) — 楚斯特(Чуст) — 喀山塞(Кассансай)一帶的塔吉克語北部諸土語的語音和語法(第2卷)。

斯拉夫語言學方面的最卓越著作是費林(Ф. П. Филин)的“古基輔時期俄羅斯文學語言詞彙”(«Лексика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древнекиевской эпохи»),這部著作1949年發表在列寧格勒赫爾岑師範學院學報第80卷上。這部著作的優點在於,它在俄語歷史詞彙學中第一次把古俄語詞彙作為有複雜的相互聯繫和規律性的一個體系來加以闡述。費林分析了古俄語的各種意義層(смысловые пласты)後確信“往年故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反映了古基輔時期俄語的真實狀況。基輔時期古俄語在詞彙發展上有其特殊規律和搖擺不定的現象。這是教堂斯拉夫語詞彙層同東斯拉夫語言基礎有機溶合的結果。按費林的意見,這種溶合的原因是古俄語很早以前就已開始作正在形成中的俄羅斯部族的部

落間的共同語言，形成这一部族的中心在当时是基輔。

費林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俄語語言学方面的有趣著作，而且对普通語言学來說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是企圖在体系分析基础上来系統整理历史比較語言学所积累起来的事实的第一個認真嘗試。这位研究者借此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构拟出所分析时期語言中的詞彙过程和运动的情景。

苏联語言学还以日尔孟斯基 (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 的極出色的著作丰富了日尔曼語言学。这部著作就是 1956 年出版的“德語方言学” (《Немец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日尔孟斯基亲身对居住在苏联各地区操德語方言的人进行了多年的观察，并且仔細研究了已有的关于德語方言学問題的著作，他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这部带有广泛历史比較回顧的比較描写性的大作。由于作者作了历史比較回顧使得他有可能提出并按自己的方式解决各种德語史的复杂問題。可惜的只是，在这部意义和篇幅都很大的著作里沒有德語各方言比較詞彙学的地位。

近来还出版了一些非印欧語方面的內容可靠具有深刻的历史比較性質的著作。語言科学因得到这些著作而丰富起来。特別应当指出的是桑热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 的“蒙古諸語言比較語法”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和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突厥諸語言組所編写的“突厥諸語言比較語法研究”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近年来苏联語言学的特点在于，关于印欧諸語言和非印欧諸語言的研究著作多是描写性質的。之所以造成这一特点，部分地是由于 1950 年以前馬尔 (Н. Я. Марр) 学派在苏联語言学界佔統治地位，而这个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历史比較語言学在苏联的發展，部分地是由于苏联語言学家对語言学研究上的結構原則有明显的爱好，特別是当研究的对象是苏联一些民族的很少研究过或根本未研究过的語言时。这种对語言分析的結構方法的爱好当然不能看成是什么錯誤的事情。科学地描写和系統整理具体語言材料无疑是有其优点的，特別是語言材料具有專門特点时。但描写的方法不应当成为併吞一切的方

法，还需要有历史比較語言學方面的各种像样的著作，必需創造条件使我們出版物中不仅出現小文章而且出現研究印欧諸語言或其他語系諸語言历史比較語法的大問題的大部头書籍。苏联語言學是有多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和一切前提的。